臺大歷史學報第 69 期
2022 年 6 月，頁 1-53

BIBLID1012-8514(2022)69pp.1-53
2021.2.26 收稿，2022.6.14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206_(69).0001

土龍山傳奇——滿洲國時期在地農民的抗日及其敘事

林 志 宏 *

提 要

1934 年 3 月 10 日在黑龍江省依蘭縣爆發「土龍山事件」，肇因於民眾不滿日本殖民當局強徵土地和沒收武器，以致有八虎力屯第五保保董謝文東組織「民眾救國軍」的反抗之舉。這場發生在滿洲國時期的武裝衝突，歷時數月，帶來深遠的影響，它不獨為一場單純的「民眾暴動」，更凸顯了日、滿雙方對殖民統治方針上的矛盾，也預示日後中國共產黨對東北政局的衝擊。

筆者從以下幾點釐清事件的始末及定位。首先，移民活動得到來自殖民者內部的挑戰。日本關東軍的試驗遭逢挫折，引發不少在滿日人的質疑。最具體之證例乃導致七名日系縣參事官不滿，認為與「民族協和」精神相違，於是公開反對和集體請辭。其次，滿洲國方面也有若干反彈聲浪，使日方終於在 1935 年 4 月設立「拓政科」，共同參與開拓殖民活動。後來滿方又積極爭取協調，在東京訂定「滿洲開拓基本要綱」。復次，一場由地方農民展開的抗日活動，轉為充滿意識形態的場域。中共打出「統一戰線」口號，吸收謝文東部隊成為「東北抗日聯軍」。滿洲國以掃蕩匪賊／中國共產黨為訴求，進行軍事討伐，更在謝文東投降後予以大肆宣揚。戰爭結束後，謝文東卻因親近國民黨而遭共產黨活捉和處決。最後本文將檢視土龍山軼事於境外流傳情況，並探討其中代表的意涵。

關鍵詞：土龍山事件　謝文東　滿洲國　日本帝國主義　殖民統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1520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E-mail: mrc@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日本移民事業與當地農民反抗行動
二、滿洲國政府的因應及日系官員的挑戰
三、日滿矛盾及其重擬拓殖方針
四、「農民抗日大軍」在意識形態中的角力
五、境外敘事、宣傳及戰後形象的變遷
結 語

前 言

研究滿洲國的治理，大概都無法忽略來自日本殖民之影響。學者在描述各項統制措施之際，經常從「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來定位滿洲國的角色，[1]強調由上而下單方面的統治策略。然而，這類的歷史書寫過度簡化，往往使得人們於檢視其中過程時覺得理所當然，而忽略了可能潛藏的規模及能量。在一個動態的環境裡，本來最初微小的變化，卻能帶動長期且深刻的反應，好比俗稱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1 「非正式帝國」意即「正式帝國」統治形式之外的「間接統治」關係。據巴頓（Gregory A. Barton）的說法，係指「一國或地區對於他國或地區的菁英形成、認同和交流帶來主導性的影響」，其中包括貿易、投資、移民、公私救助、文化交流等，均可視為「非正式帝國」的間接統治。從歷史來看，1870 年代中後期全球出現「反帝國主義」的聲浪，促使海權帝國必須改弦易轍，以一種更高明、更有效的辦法繼續維持其世界霸權地位。譬如大英帝國維繫對印度及遠東地區的殖民同時，還輸入大量資本至阿根廷、巴西和美國等國家，形成各種金融體制模式的依賴，如此遠比正式的殖民占領更為有效。Gregory A. Barton,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Rise of One World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7. 在 20 世紀，中國則以「次殖民地」角色被西方列強支配貿易、生產及市場，毋寧也是非正式帝國的典型。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ed. Wolfgange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90-314.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般。本文所要探析的「土龍山事件」（又名「依蘭事件」），即是如此多重有色眼鏡穿戴下所形成的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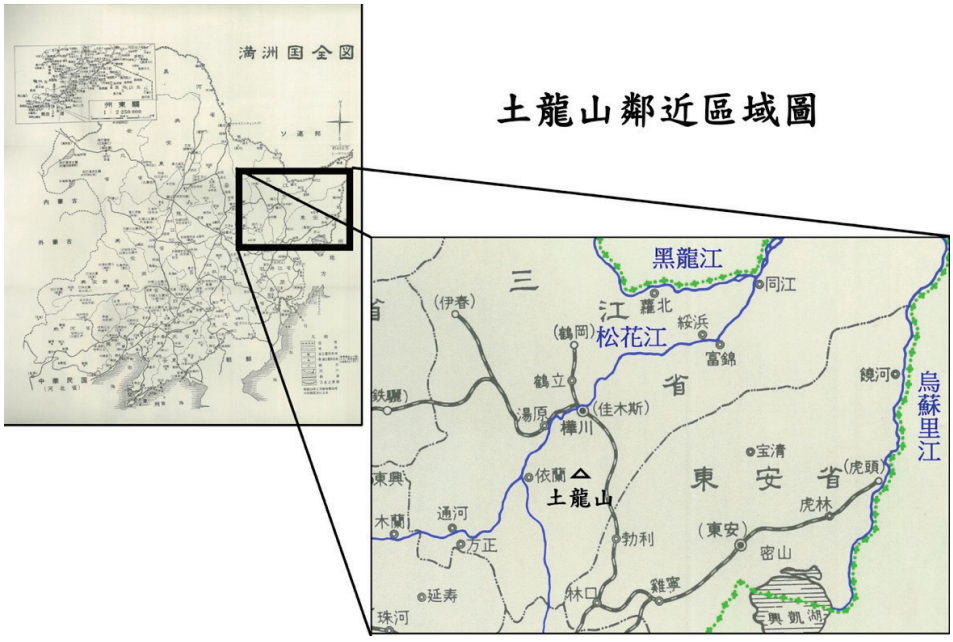
這樁事件發生在 1934 年 3 月 10 日，地點位於黑龍江省依蘭縣（今屬樺南縣，1946 年 6 月 10 日設治）太平鎮。當地係由三江（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沖刷而成的平原，境內地勢險要，東高西低；同時土壤肥沃且水利資源充足，適合大面積耕種作業。[2]（參圖一）事件導火線看似純因殖民而引起的地方百姓反滿抗日之舉（詳後），惟後世研究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凡論其來龍始末，均依照各自立場發言。例如，山田豪一力主這是日本移民措施不當，所導致的一場反抗。[3]爾後在此一基礎上，學者紛紛展開各項議題，探究土龍山起事背後代表的歷史意義。像運用現存檔案，或以「農民革命」、「移民開拓」、「國策會社」等不同視角，釐清日本軍國主義對滿洲殖民政策之主導。[4]

2 黑龍江省樺南縣志辦公室編，《樺南縣志》（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頁 129。

3 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上）〉，《歷史評論》第 142 号（1962 年 6 月，東京），頁 46-64；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中）〉，《歷史評論》第 143 号（1962 年 7 月，東京），頁 62-77；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下の一）〉，《歷史評論》第 145 号（1962 年 9 月，東京），頁 66-73；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下の二）〉，《歷史評論》第 146 号（1962 年 10 月，東京），頁 65-77。

4 淺田喬二，《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來社，1973），頁 467-477；高橋泰隆，〈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満州」農業移民〉，《土地制度史学》第 18 巻第 3 號（1976 年 4 月，東京），頁 47-67；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1998），頁 522-532；劉含発，〈満洲移民の入植による現地中国農民の強制移住〉，《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第 21 巻（2001 年 8 月，新潟），頁 361-378；張素玲，〈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2 期（2009 年 3 月，臺北），頁 33-72。其中，小都晶子 2019 年的專著《「満洲国」の日本人移民政策》（東京：汲古書院，2019），係由其博士論文修改出版，幾乎網羅了所有中、日文史料。

臺灣人權暨和解圖書資料館



圖一　滿洲國中土龍山的地理位置

其中，最耐人尋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定調事件為「暴動」。眾所習知，「九・一八」事件前，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滿洲）的活動幾乎毫無成效。直迨傀儡政權成立，中共隨著反抗勢力義勇軍組成游擊武裝隊伍，才逐漸鞏固其發展，成為近人所謂「窮途末路中苟延活命的伎倆」。[5]就在這波高舉反滿抗日的浪潮下，中共號召民眾建立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擴大結合參與土龍山事件的人物加入「統一戰線」，形成殖民當局眼中的一股「惡勢力」。只不過，1949 年中共建政後，官方卻淡化乃至屏除事件本身的影響。如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編寫的「東北三史」系列裡，[6]吾人無從得悉事件全貌；中、日雙方

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 311。

6 譬如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頁 353-358，謝文東的角色顯然相當模糊，遠不若中國共產黨的地位。該書與《東北淪陷史》、《中共滿洲省委史》合稱「東北三史」，將由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行。而 2009 年《東

臺灣大學圖書館

學者的滿洲國研究，則將標題逕自定為「農民暴動」。[7]一場突如其來的反抗殖民事件，為何在訴諸「農民起義」的共產政權裡並未得到青睞，最終落成這樣的結局？其中緣由可謂相當詭譎。

筆者搜集滿洲國大同學院資料時，無意間留心到土龍山事件，從而追索其中各種林林總總的現象。藉由泛覽其中過程，發現滿洲國殖民統治中「蝴蝶效應」所帶來的影響。簡言之，這次事件雖為突發情況，但實歷經漫長的發酵期，且影響深遠，迄至戰後仍未結束。[8]在近代中國史上，類似題材絕非僅見，甚有更為鮮明的敘事及神話被一再重構。[9]但就土龍山事件來說，人們僅視之為滿洲國時期的一場火花，並無體察到當中複雜性，還有各方折衝之關係。正如法國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不斷地提醒我們：史實應該要關注那靜默「洋流」，而非掌握曇花一現的「巨浪」。[10]土龍山事件雖為「瞬間的事情」，毋寧該從長時段的歷程來理解。

北抗日聯軍史》率先完成送審，另外兩書僅有初稿。見《東北三史》編纂工作領導小組，〈《東北三史》編寫說明〉，收入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頁前說明，頁 4。

7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224-226。此書另有日文版，討論見孫繼英著，上條厚譯，〈土竜山農民の抗日蜂起〉，收入植民地文化学会編，《近代日本と「満州国」》（東京：不二出版，2014），頁 243-248。

8 這裡筆者參考了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的討論，即瞭解事件發生是否有一定的類型與相關性。從定義上來說，某事件發生，預設了存在該事件尚未發生前的時段。因此，事件史分析法即是探討該事件發生前的時段內各種資料。然而，要概念化事件尚未發生的時段，更應釐清「風險期」（risk period）的假設。見 Kazuo Yamaguchi 著，杜素豪、黃俊龍譯，董旭英校閱，《事件史分析》（臺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9-12。

9 譬如 1898 至 1900 年發生在華北的義和團事件，就是一處顯例。柯文（Paul A. Cohen）曾對此歷史事件進行過著名的論證討論，見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劉北成譯，《論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頁 30-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日本移民事業與當地農民反抗行動

日本對滿洲開啟的大規模移民工作，應屬 1915 年 4 月由關東都督府所建的「愛川村」。[11]由於農業經營產生諸多困難，此一計畫最終宣告失敗。儘管奉系張家主政時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另以附屬地內宜耕土地供前來的日僑務農，惟受限於各項因素，成效不彰。這使得滿洲國成立之際，部分人士剛開始並不看好日本移民滿洲的事業，[12]之後才逐漸改觀。

（一）滿洲建國後的「武裝移民」與土地徵收不公

滿洲國建立之初，殖民當局便著手實行移民政策。但中國東北各地反對聲浪不斷，關東軍為求軍事安定，規劃以退伍軍人施行「武裝移民」。推動該案的關鍵人物是東宮鐵男（1892-1937）與加藤完治（1884-1967）兩位。[13]他們不僅得到日本拓務省支持，且殖民滿洲的構想更獲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1889-1949）賞識，認為此事與其「滿蒙建國」的理念不謀而合。[14] 1932 年 9 月，日本政府先以治安惡化的吉林省樺川縣為目標，

11 該地原屬遼寧省金州大魏家屯。「愛川」二字係山口縣愛宕村與下川村兩地的聯合名稱，是在關東都督福島安正（1852-1919）推動下，將兩村 19 戶 48 人移入滿洲的工作成果。王元周，〈日本在中國東北移民的農業經營（1905-1945）〉，《抗日戰爭研究》1999 年第 4 期（北京），頁 77；安藤哲，〈日露戰後の満州移民村〉，《那須大学・宇都宮共和大学都市經済研究年報》第 5 卷（2005 年 10 月，那須塩原），頁 198-199。

12 譬如木下通敏舉出 8 項理由：（1）大農不肯投資經營；（2）日本人到東北，都想在軍政、警察、交通方面獲得一席，或從事土木工程，賺一點錢回國；（3）移植區域和他們的原籍交通太方便，而且也太近；（4）有的移住地過於僻遠；（5）每年農作期太短，又無適當副業；（6）生活不慣；（7）農耕方法不同；（8）氣候寒暖不適。木下通敏，《滿洲に於ける農業経営の実際と移民問題》（東京：斯文書院，1934），頁 253-267。

13 秦賢助，《東宮鉄男：満洲移民の父》（東京：時代社，1941），頁 250-260；高橋泰隆，《昭和戦前期の農村と満洲移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49-151。

14 桑島節郎，《満州武装移民》（東京：教育社，1979）；鈴木隆史，《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 522-5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行第一次試驗移民（共 500 人，稱「彌榮村開拓團」）；1933 年 7 月第二次試驗移民團（稱「千振村開拓團」）前往依蘭縣，也有 500 人參與。

樺川、依蘭兩縣俱處三江平原之上，位居中國極東地區。「依蘭」二字是滿語譯音，當地另有漢名「三姓」，乃盧、舒、葛三大姓的群聚部落。史載依蘭土城建於 1715 年，住民係漢、滿、伊斯蘭人，1930 年代後加上遷居前來的日本、朝鮮等族群。由於地勢三面環水，每至春、夏兩季航行期旅客如雲，大豆、木材貨堆似山，以此為集散地；但水源豐沛亦有江河氾濫之虞，故「水淹三姓」的說法不脛而走。像 1932 年 8 月「北滿」發生水患，即帶給地方民眾不少災難。[15]據統計，滿洲農產品因該次水患，總產量減少近四成，連帶使得農民日常主食——高粱的價格漲幅也達三至四倍，影響特深。此外，受英、德油脂工業相互對抗，以大豆為經濟作物主體的市場原料價格大幅滑落，故「北滿」農業與社會爆發嚴重恐慌，失業景況到處可見。於是地方青壯年鋌而走險，農民們紛紛成為盜匪；貧弱者乾脆放棄耕地種植，甚有出現販賣子女、餓殍遍野的情形。[16]

滿洲國即在如此不穩定的社會基礎之下，飽受農村破產之苦；現又因日本採取急進的移民政策，情況更形嚴重，無異雪上加霜。滿洲國原要高唱建立一個理想國度，卻因內、外部環境影響，致使各處「匪賊」充斥，成為新政權的標籤。[17]尤有甚者，殖民者與當地民眾的意見分歧，

15 上述討論均見丹楓，〈依蘭風光〉，《新滿洲》第 2 卷第 9 號（1940 年 9 月，長春），頁 189。這場水患係由於接連兩月陰雨綿綿，致使江水暴漲，至 8 月 5 日時，松花江的水位達海拔 133.51 公尺，比歷史上最高紀錄 1914 年的 133.14 公尺還高，於是官方成立救災委員會。見哈爾濱清理水災善後委員會編，《壬申哈爾濱水災紀實》（哈爾濱：哈爾濱特別市公署，1934）。相關討論見 Tim Wright, “Legitimacy and Disaster: Responses to the 1932 Floods in North Manchuria,” *Modern China* 43, no. 2 (March 2017, Beverly Hills), pp. 186-216.

16 有關這場「滿洲農業恐慌」的概述，見田中武夫，《橘樸と佐藤大四郎：合作社事件・佐藤大四郎の生涯》（東京：龍溪書舍，1975），頁 33-36。

17 直到 1935 年，有西方記者估計滿洲盜匪不下 20 萬人；日本軍方承認滿洲國匪賊問題的

臺灣人學者滿洲國資料庫

彼此以「匪」互稱。[18] 1933 年末起，雙方仍爭執未歇。關東軍先是訴求「強化治安」，規定民間自衛團需繳交槍械，嗣後雙方關係日益惡化。其中，最大矛盾即為強制購買土地的問題。

購地糾紛係於第二次試驗移民期間，導致土龍山農民集體出面抗議。這項徵收計畫，曾被國務院總理鄭孝胥（1860-1938）形容是「善意的惡政」，[19]主要由關東軍管轄哈爾濱的第十師團負責執行。實施辦法為地主或少數委任者出面繳交地契，填具簡要契約手續後完成。為了避免非議，徵收工作並非軍方直接涉入，而由東亞勸業株式會社委派專務花井脩治（1888-?）出面。[20]同時為防止怨懟產生，關東軍公告「若有不法之徒捏造言詞或煽動民心者，將處以嚴厲懲罰」。[21]徵收計畫經費由滿鐵出資 300 萬日圓，率先收購哈爾濱郊外的 1 萬町步（1 町步即 3,000 坪或 15 畝，約為 1 公頃面積）；1934 年 1 月，拓務省再追加 200 萬日圓，命第十師團組織兩班往密山縣（80 萬町步）及樺川、依蘭、勃利等

嚴重性，甚至認為很多即是失去土地的農民。見伍海德（H. G. W. Woodhead）著，張珂等譯，張文琳等校對，《我在中國的記者生涯：1902-1933》（北京：線裝書局，2013），頁 192；瞿明宙，〈日本移民急進中的東北農民問題〉，《東方雜誌》第 32 卷第 19 號（1935 年 10 月 1 日，上海），頁 61-71。

18 日人稱中國農民的抵抗為「非法」，係屬「匪賊」；而日本移民則被當地居民戲謔為「屯匪」。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東京：全国拓友協議会，1980），頁 103。

19 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頁 787。

20 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成立於 1922 年 1 月 20 日的奉天市（今瀋陽）。該公司額定股本為 2,000 萬日圓，係由日本政府主導，將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滿鐵、大倉組已取得的土地作為投資，以在中國東北取得和經營土地、招募和扶植移民為目的。關於該會社歷史，見東亞勸業株式會社編，《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拾年史》（大連：編者印行，1933）；江夏由樹，〈近代東北アジア地域の経済統合と日本の国策会社—東亜勧業株式会社の事例から—〉，《東北アジア研究》第 8 号（2004 年 3 月，仙台），頁 6；衣保中、馬偉，〈日本「東亞勸業會社」對中國東北土地資源的掠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7 卷第 5 期（2017 年 9 月，長春），頁 83-91。至於花井脩治是愛知縣人，1909 年入滿鐵工作，後為滿洲拓殖公社理事。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東京：編者印行，1940），頁 618。

21 〈密山、依蘭農地買收狀況ノ件（昭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收入遼寧省檔案館編，《滿鐵密檔：滿鐵與移民》第 1 分卷第 6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74。

臺灣人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縣（共 120 萬町步）實施收購。[22]

之所以發生嚴重摩擦，癥結點在日人以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強迫農民無條件接受。當時正常價格為熟地每公頃 50 到 100 日圓，但殖民當局以 15 日圓要求農民讓渡；至於荒地每公頃為 5 到 20 日圓不等，殖民當局也僅以 2 到 4 日圓收購。顯然此一粗暴的「掠奪舉動」，連滿洲國也公開表示「拙劣」。[23]對堅拒不交地契的農民，關東軍加以施壓，強搜有無不法的違禁品，甚至發生以槍托毀壞民宅牆壁的情形。此外，殖民當局認定「北滿」的社會秩序紊亂，為求「維持治安」，沒收民眾自衛用的槍枝。[24]其中被剝奪感最為強烈的，是農村內原有實權、足以號召壯丁的地方人士，[25]本文主角謝文東（1887-1946）即箇中代表。

生於奉天省寬甸縣永甸鎮碾子村的謝文東，在鄉里間即以「悍匪」著稱。1925 年，他因購地欠債引發糾紛，雇用他人綁架同鄉，並勒索小洋錢 4,000 圓。事後經人舉發，謝氏被迫遷至黑龍江省依蘭縣，投靠姑舅。隔年因緣際會下，謝文東充任八虎力屯第五保保董（村長）兼自衛團長。[26]由於個人擁有土地、家屋等恆產，謝逐漸變成日人眼中所謂「地

22 〈日本人移民適地吉林省東北部土地買收經過ノ件（昭和九年六月三十日）〉，收入遼寧省檔案館編，《滿鐵密檔》第 1 分卷第 6 冊，頁 95-99。

23 滿洲國軍政部軍事調查部編，《滿洲共產匪の研究　第二輯》（新京：編者印行，1937），頁 116。相關討論見岩崎富久男，〈中國東北における抗日救亡運動—東北抗日義勇軍の活動—〉，《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 46 卷（2000 年 3 月，東京），頁 60。

24 「土地買収と土龍山事件との関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1002972600、陸軍省-陸滿密大日記-S9-4-3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筒井五郎，《鉄道自警村—私說・滿州移民史—》（東京：日本図書刊行会，1997），頁 180。

25 原名「李德配」的共產黨員季青（1912-1988），在事件爆發前，曾與孟昭堂、傅學純等人共組「反日大同盟土龍山支部」。他的理由是認定「工作對象不是在農村，而是地方壯丁團的各保事務所，因為那裡正是農民的各種思想最集中的場合」。由此可知，農村裡的武裝勢力正是帶動反滿抗日的最佳來源。季青，《於無聲處聽驚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 2。

26 東北人物大辭典編委會編，《東北人物大辭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 16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豪農」，[27]深孚眾望。

（二）土龍山事件始末

針對殖民者到處收購土地的情形，身為保董的謝文東跟他人一樣，猶疑是否該言聽計從。蓋這攸關身家財產，一旦交出地契、配合當局併購，等於犧牲自己權益。所以，殖民者此舉令謝氏乃至太平鎮一帶的農民忿忿不平。田伯烈（Harold. J. Timperley, 1898-1954）即預言：「無論這件事辦得對與不對，但事實上卻是大大的激起了公憤，以至於使農民們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寇了。」[28]在類似情境之中，謝文東被鄉眾逼而表態，只好硬著頭皮犯下忤逆作為。1934 年 3 月 5 日，他糾集約 700 人的隊伍，商討如何肆應殖民者無理的要求；9 日，這支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自衛團會師於依蘭縣行政中心——太平鎮，後即攻入警察署，並在鎮西白家溝埋設伏兵。謝氏憶述當時「家並無準備，事情起來時才急忙把老的、小的送到遠處親戚、朋友家去，走時我一狠心把房子也燒了」，[29]可見過程相當倉促，係屬無心插柳柳成蔭。

當時是日本第十師團第六十三聯隊駐防依蘭，該聯隊不少成員來自鳥取縣，[30]由飯塚朝吾（1883-1934）大佐（職級是「准少將」，對應到中國軍事官階，約為上校及少將之間）領軍。3 月 10 日飯塚聞訊後，親

27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頁 645。

28 田伯烈，〈「滿洲國」視察記〉，《獨立評論》第 121 號（1933 年 10 月，北平），頁 11。田伯烈是英國《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的駐華記者。

29 謝文東的話是引述他人回憶。見郝益之，〈我對謝文東的耳聞與眼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千秋功罪——佳木斯文史資料》第 10 輯（佳木斯：編者印行，1989），頁 264。此處引用時，個別標點偶有更易。郝氏於 1939 年為三江省公署警務廳警備科擔任屬官；謝文東投降後，郝曾負責安置其家屬生活。

30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鳥取縣徵兵共分成兩區進行，一為氣高郡以西的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另一為鳥取市以東的步兵第四十聯隊。見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史編纂委員会編，《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史》（松江市：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史編纂委員会，1974）。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率一小分隊和少數警察前往土龍山，企圖說服謝文東本人。豈料行至半路，被埋伏的自衛團攔截，雙方發生爭鬥，結果飯塚朝吾與同行的警察隊長蓋文義等 18 名被打死，其餘 26 名遭俘。事後聯隊增援派兵，仍為自衛團所破。自衛團在地方人士王乃華的家中召開整編會議，推舉謝文東為總司令、景振卿（1880-1934）為前敵總指揮，共 2,000 餘人定名為「民眾救國軍」。

土龍山反抗情事迅速地流傳開來。13 日，滿洲國內重要的報紙《大同報》、《泰東日報》率先報導，[31]連遠在關內天津的《大公報》也以「偽軍反正」揭露。[32]比較別出心裁的是《盛京時報》，強調飯塚的個人形象：

> 名譽戰死之飯塚大佐，前在饒河方面討匪之際，乘橇而行、冒雪而進，急襲饒河，以勇冠三軍而知名者也。又該大佐之豪膽與愛部下，同有評。[33]

說他「以勇冠三軍而知名」，慘遭劫難，成為第三位在滿洲國犧牲的日本軍官。當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1881-1960）得悉衝突後，既驚且怒，決定以飛機、坦克、大砲等現代化武器嚴懲自衛團。最後，殖民當局出兵掃蕩土龍山附近的 17 個村莊，屠殺了農民 5,000 餘人。事件的消息經封鎖一個月後，《濱江報》才特刊飯塚等日軍遺骸裝車運回佳木斯之景況。[34]但血洗行動並未壓制地方民怨，反倒促使謝文東這位身處偏鄉的自衛團團長，歷此一戰而家喻戶曉，頓時成了知名的「抗日英雄」及「義民」。[35]

---

31 〈飯塚○隊於土龍山與匪五百激戰　飯塚大佐戰死〉，《大同報》（新京），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7 版；〈飯塚討伐隊依蘭附近剿匪　飯塚大佐中彈陣亡〉，《泰東日報》（大連），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2 版。

32 〈三姓偽軍反正　日軍官十餘人失蹤〉，《大公報》（天津），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4 版。

33 〈土龍山之激戰　飯塚大佐戰死〉，《盛京時報》（奉天），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4 版。

34 馬彥文，〈土龍山農民起義打死日寇飯塚少將〉，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1），頁 39。

35 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満洲国史・総論》（東京：満蒙同胞援護会，1970），頁 430-4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に數彈を受けて
壯烈なる戰死
飯塚松江部隊長と鈴木少尉
土龍山附近の匪賊討伐戰

（ハルピン十二日發電）○○團司令部發表）佳木斯附近に於ける冬季討伐に引つゞき治安工作をなしつゝありし飯塚大佐の率ゐる○○隊は三月九日佳木斯、依蘭附近に於いて匪賊密集せりとの報を得たので同大佐自ら十日騎手兵を率ひ匪賊密集地たる依蘭東方十里の土龍山々麓に對し滿洲國軍と協力して攻撃を開始したが土龍山西方に於いて凡五百の匪賊と衝突激戰の後占領した、右戰闘に於いて飯塚大佐及鈴木少尉は身に數彈を受け壯烈なる戰死を遂げた

圖二　日本地方報刊載的土龍山事件

資料來源：〈身に數彈を受けて　壯烈なる戰死　飯塚松江部隊長と鈴木少尉　土龍山附近の匪賊討伐戰〉，《因伯時報》（鳥取縣米子市），1934 年 3 月 14 日，第 1 版。

一段移民活動引發的地方動亂，隨報刊檢視逐步放大後，竟達難以收拾的地步，寂寂無聞的土龍山頓時在殖民母國日本（圖二）與西方媒體上獲得廣大的注目。[36]為了尋求解套辦法，殖民當局一度派員前往該地，對開拓團進行調查，[37]之後更於報上聲稱：

36 關於英文媒體對土龍山事件的注意，可舉《紐約時報》為例。見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34, p. 5.

37 〈土龍山事件中村上指導官已戰死　加納參謀長赴現地調查〉，《大同報》，1934 年 3 月 14 日，第 7 版；中村孝二郎，〈依蘭事変余聞〉，收入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東京：全国拓友協議会，1980），頁 120-122；宗光彦，〈千振街の匪襲と中村氏の思い出〉，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滿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614-6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此戰鬥，以為宋雷（前係匪賊出身）之依蘭地區警備隊，必盡心協力，一同剿滅匪賊軍部，不意竟與匪軍通款反擊日軍，致陷飯塚部於苦戰。接此急報後，駐屯佳木斯附近之吉川、曾木兩部隊，當即聞往增援，十一日遂將該匪賊擊退於土龍山之山地（距依蘭東方六十里）。而增援之橫山部隊，又由依蘭往擊匪軍，於途中發現飯塚大佐遺骸，且收其屍體，且與匪賊交戰。[38]

可見殖民當局認定：追剿工作無法順利完成，其實是在內外匪賊的互通下，致使殖民者進退維谷。

最初民眾救國軍挾帶如虹氣勢，襲擊「北滿」當地日軍，確令殖民者捉襟見肘。像 1934 年 4 月 23 日，謝部搶攻樺川縣永豐鎮的駝腰子金礦，金礦局長楊玉書（1886-?）被迫率隊逃往佳木斯。1930 年代，中國東北金礦「富甲全國，即在東亞除俄屬遠東外，亦鮮出其右者，而尤以黑龍江之砂金開採最盛，吉林次之，遼寧又次之」，[39]故滿洲國建立後，「淘金熱」風靡一時。其中駝腰子金礦最受矚目，設有相關辦事處。[40]謝文東及其部屬既瞭解其中金礦物產價值，又對地形掌握相當熟悉，故決定奪取駝腰子，以供財力支撐。民眾救國軍也因此一戰致勝，更加聞名遐邇。

但如此榮景終究難以維持太久。約莫兩個月光景，謝文東及民眾救國軍漸顯頹勢。一方面，殖民者四處宣撫，投入大量人力、物資等優勢，企圖軟硬兼施，改變民心向背；另一方面，謝又為討伐軍所迫，率部擬

38 〈飯塚大佐陣亡　由於降誹倒戈　關東司令部發表〉，《泰東日報》，1934 年 3 月 17 日，第 2 版；〈飯塚大佐戰死一役　乃係壯丁團長通匪反動作用〉，《盛京時報》，1934 年 3 月 17 日，第 4 版。

39 引文見金丸精哉，〈滿洲採金餘譚〉，《滿蒙》第 15 年第 2 號（1934 年 2 月，東京），頁 117-133。

40 小山一郎，《滿洲國及北支の金鑛及砂金》（東京：科學主義工業社，1938），頁 18-21。有首民歌題為「駝腰子金礦本是好地方」，足見該處地位。黑龍江省樺南縣志辦公室編，《樺南縣志》，頁 9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潛逃蘇聯邊境，惟遭滿洲國軍隊圍剿。[41]除了其餘地方武裝自衛團的內鬨外，[42]民眾救國軍於最感困頓之際，曾向上海《申報》發出三次求救的訊號。[43]甚至有一封以謝文東名義、並謂「吉林自衛軍代理總司令」的千字抗敵宣言書，公開促請「全國民眾一致奮起，共謀禦侮」，內文寫道：

> 我軍崛起邊陲，兵燹之後，諸感匱乏，久與倭寇抗衡，固知力有未逮。然戰亦亡，不戰亦亡，為民族謀生存、為國家爭榮譽，縱斷頸折脰，粉骨碎身，亦所不惜。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敢計也。[44]

此足證民眾救國軍已瀕臨無以為繼的地步。在這樣艱難環境裡，謝文東必須尋求其他辦法，直到投降滿洲國官方為止。

二、滿洲國政府的因應及日系官員的挑戰

土龍山事件勢必對殖民當局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它是滿洲國建立後非奉系勢力對殖民統治的反撲，且由毫不起眼的農村社會所致。整起事件令官方重新檢討日本移民活動，包括政策需改弦易轍。

---

41 〈謝文東窺伺虎饒　趙尚志潰逃無蹤〉，《泰東日報》，1934 年 6 月 19 日，第 7 版。

42 據親歷者描述，當地民眾亦有對日本移民開拓團抱持友善態度者。如七虎力地區「九里六」部落的王喜信，因與謝文東的立場不同而遭狙殺，後有日方給予「義人王喜信之碑」。中村孝二郎，〈依蘭事変余聞〉，收入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頁 122。

43 前兩次分別為李杜（1880-1956）與王德林的電函，呼籲施壓日本與各界支援救助。〈李杜致顧維鈞電　痛述依蘭民衆受摧殘　請報告國聯為民呼籲〉，《申報》（上海），1934 年 6 月 1 日，第 12 版；〈王德林告關內同胞書　關外同胞慘遭屠殺　艱苦奮鬬毋忘國仇〉，《申報》，1934 年 7 月 4 日，第 14 版。

44 〈吉東抗日領袖謝文東等　發表宣言痛陳抗敵經過　東北民衆慘遭殘害　甯為國死不為奴生〉，《申報》，1934 年 7 月 23 日，第 8 版。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一）軍事「討伐」與政治宣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勢力如雨後春筍般展開。隨著日本次第推展殖民政策，東北各地的反抗聲浪風起雲湧，謝文東起事更對民心造成莫大磁吸效應。時人如此觀察：

> 一九三四年是東北民眾經濟上最痛苦、日寇開始牠的大規模的土地掠奪的一年。義勇軍便從千百萬的饑餓破產的農民大眾中，得到新的大量補充。三月間依蘭的反抗日寇沒收土地的大規模農民暴動，在第二期的義勇軍運動有很大的影響。[45]

「第二期的義勇軍運動」發生於滿洲國內各地農村社會，不同於先前抗日之舉。雖然 1934 年時任協和會中央事務局次長的山口重次（1892-1979）宣稱：謝文東並未獲得一般農商民眾支持，地方百姓仍對日本皇軍表示歡迎，[46]但情況絕非如是。如表一所見，1935 年民亂攀至前所未有的高峰，年度逼近 4 萬次，直迨 1936 年惡化的情況依舊。這些大小不斷、來自基層的「聲音」，迫使統治者必須正視。

在軍事上，滿洲國展開各項「討伐」工作。1933 年 6 月起，關東軍以「治安第一」為訴求，施行武力肅清。隔年擴大為掃蕩共黨，範圍包括間島省一帶，以及吉林省的樺甸、磐石縣等紅軍（共約 3,000 人），還有毗鄰滿、蘇國境處盤據之王德林（1873-1938）、謝文東、趙尚志（1908-1942）部隊（共約 8,000 人）。由於深感蘇聯將援助這些共產游擊勢力，且為防止匪團向外突圍，故殖民當局從滿洲國軍裡擇其最優部隊，配置於國界駐守，以利封鎖。[47]

---

45 金仲華，〈七年來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收入國新社編，《淪陷七週年的東北》（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據 1938 年上海書店出版影印），頁 81。個別標點及文字偶有更易。

46 〈満州国協和会中央事務局次長山口重次関東軍司令部参謀長宛（康徳元年六月八日）〉，收入国立国会図書館専門資料部編，《斎藤実関係文書目録》（憲政資料目録第 18 種；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1995），「書類の部 2・昭和期日記、伝記資料等」，未標頁碼。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是西尾壽造。

47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編，《滿洲建國五年小史》（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7），頁 113-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滿洲國「匪賊」出現及討伐結果

事項 / 年度別	出現回數	殖民當局討伐的死傷人數	
		死	傷
1932	3,816	7,591	5,160
1933	13,072	8,728	2,381
1934	13,395	8,909	4,264
1935	39,150	13,338	11,815
1936	36,517	10,713	7,988
1937	25,487	7,663	5,242
1938	13,110	3,693	2,876
1939	6,547	3,168	1,753

資料來源：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満洲国史・各論》（東京：満蒙同胞援護会，1971），頁 312。

武裝鎮壓之外，新的行政措施及移民宣傳也陸續展開。行政改革中最要者為改變省級政區。為了確保中央集權，滿洲國採取「分而治之」原則，不斷改組地方行政機構。其中影響最鉅者，係 1934 年 12 月 1 日將東四省改為十省，於「北滿」新設濱江、三江、黑河三省，徹底打破清代以來固有的行政疆界。[48]

其次是移民充實邊防的宣傳。事件發生後，對最初提議移民的東宮鐵男打擊甚巨。據稱，飯塚部下後來還在其牌位前寫下「殺飯塚聯隊長者，東宮也；令謝文東匪賊化者，東宮也」。[49]類似不安情緒蔓延開來，帶給移民工作若干影響。如第二次移民團（湖南營）遭謝文東等襲擊，造成 11 人死亡，曾令日方偌大震撼，報紙一度形容開拓事業「陷入悲

48 傅林祥、鄭寶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131。其中黑河省承繼自清代黑河道，其他兩省以松花江沿岸的經濟及治安規劃；此外，三省均以河流與蘇聯國境遙遙相望，深具地理上的意義。〈北満三省の特色〉，《報知新聞》（大阪），1934 年 11 月 5 日，引自「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満州（2-205）。

49 石原文雄，《東宮大佐と加藤完治》（東京：潮文閣，1944），頁 278。

臺灣人口學術資料庫

境」。[50]為了平撫日本民眾，媒體積極強調「暴動」業已受控，且當地受災的農民、前來墾殖的日僑，都獲致妥善解決，滿洲國亦擬定耕地經營的相關政策。[51]此外，《東洋》雜誌介紹關稅修訂、農地商租、新鋪鐵路等舉措，以及三江省召開第一次縣長會議的討論與報導，[52]更多是訪查依蘭鄰近移民村落、遊歷介紹的文字。[53]

（二）現地縣參事官的抗議

但殖民當局遭遇最嚴峻的難題，或許並非上述「反動力量」，而是來自內部的矛盾。在土龍山事件爆發時，以「指導」地方行政為理念的日系官僚，率先揭開內部爭執的序幕。1934 年 3 月 23 至 26 日，滿洲國第一次全國縣參事官會議於國都新京（今長春）敷島高等女學校講堂召開。在議程進行期間，不少縣參事官質疑中央高唱「民族協和」的政策，認定與實情有所悖離。所謂「縣參事官」，係指滿洲國建立後，日本用以支配傀儡政權的一批官僚；他們提出「地方自治」等主張，協助縣級治理工作，可說是邁向中央集權化統治之產物。[54]質言之，縣參事官是

50 高宮太平，〈滿洲建國第五年（完）〉，《東京朝日新聞》，1936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

51 滿洲國通信社編，《滿洲國現勢》（新京：滿洲弘報協會，1937），頁 132。政策宣稱包括三方面：（1）主要用於耕地發展、（2）容納日本人和滿洲人、（3）居民將保持原樣。見〈商租問題解決し　人心全く鎮靜　滿洲國政府て發表（廿三日）　依蘭縣事件〉，《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934 年 11 月 24 日，第 7 版。

52 石川進，〈滿蒙——滿洲國關稅改正・農地商租と所謂土龍山事件・三鐵道新設〉，《東洋》第 38 卷第 1 號（1935 年 1 月，東京），頁 136-138；〈三江省第一次縣長會議に於ける日本農業移民招致問題〉，《東洋》第 38 卷第 10 號（1935 年 10 月，東京），頁 129-131；引田哲一郎，〈朗らかな武裝移民地・最近の永豐鎮・湖南營便り〉，《東洋》第 38 卷第 10 號（1935 年 10 月，東京），頁 38-40。其中引田哲一郎係新聞記者出身，1939 年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的奉天本社支局長。

53 相關資料不勝枚舉，如島之夫，《滿洲國視察記》（東京：博多成象堂，1940），頁 23-28；水島芳靜，《日本移民の新天地躍進三江省：佳木斯市》（東京：東亜出版社，1938），頁 124-127；白鳥省吾，《詩と随筆の旅：満支戰線》（東京：地平社，1943），頁 41。

54 有關縣參事官及「次官制」的討論，可見解學詩，〈偽滿洲國的政權體制和基層社會組織〉，收入楊天石、庄建平編，《戰時中國各地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滿洲新國成立後地方的基層行政官吏，大抵由日人負責，直到 1937 年 12 月才改為副縣長。

縣參事官由 1932 年 7 月 1 日成立的大同學院專責訓練。[55]這批日系高等官僚們懷抱「理想性格」，故於施政時屢與殖民當局意見相左。早在大同學院課程受訓之際，他們便被賦予宣揚「民族協和」建國精神的使命，期許積極投入於地方基層工作上。[56]而第一次全國縣參事官會議召開期間，與會者就抱持這樣迥異的態度不時可見。其中，像擔任縣參事官的瀧本實春（1 期生，1905-?）與荒谷千次（1 期生，1907-?），[57]即特別關懷農村蕭條的局勢。「北滿」農民由於深受大豆貶值與金融崩壞所影響，生計窮乏，以垂死面對未來。[58]而瀧本與荒谷致力研擬復興農村的計畫之餘，[59]對殖民當局強制收買土地的作法頗不以為然。

當三江地區收買農地的糾紛不斷之際，殖民當局刻意封鎖消息，故

頁 8。

55 大同學院的初步討論，請參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 643-683；林志宏，〈冷戦体制下における大同学院同窓会——日本と台湾の場合〉，收入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東京：東方書店，2020），頁 254-258。

56 滿洲國建立之初，許多日本年輕人都懷抱前往「大陸」的青春夢想。他們參加「滿洲青年聯盟」和大雄峯會，後來又進入大同學院，主觀地認為「民族協和」可實現，並期盼有朝一日將「東亞解放」。這方面情況可見安藤彦太郎，〈「九・一八」前後〉，《アジア経済旬報》第 874 號（1972 年 9 月，東京），頁 8；創立七十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創立七十周年記念　物語大同学院—民族協和の夢にかけた男たち—》（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2002）。

57 兩人生平可見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322、396；竹中憲一編，《人名事典「満州」に渡った一万人》（東京：皓星社，2012），頁 56、844；山川隣編，《戦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電報通信社，1944），頁 122。

58 民政部編，《第一回全國縣參事官會議議事錄》（新京：編者印行，1934），頁 116-118、126-131。

59 例如荒谷千次擔任磐石縣參事官，「到任後，臂助縣長進行縣政，共策農村之振興，擬有五年農村復興計劃，由省方請准」，可知其著力之處。見姚組訓監修，李翰昌協修，毛祝民總纂，《磐石縣鄉土志》（出版地不詳：磐石縣公署總務科，1937 鉛印本），頁 19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荒谷、瀧本等並不知悉實情。惟不久後兩人調任該處，驚覺當中許多非理性、脫軌之處，於是聯合其他五位縣參事官，[60]傳達不滿情緒。他們的共同看法是：謝文東「絕非匪首，不過是義民佐倉宗五郎，而蜂起的數萬農民也絕非匪徒，乃不得已一起對抗惡政的農民」；「若我們與軍方同調，對這群民眾鎮壓的話，那麼以『五族協和』、『道義立國』實踐者自任的縣參事官使命勢將無法達成」。[61]瀧本實春等人申明四主張：

> （1）終止關東軍討伐行動；（2）關東軍負責保管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所持有的地契，並引渡至縣方；（3）關於地價、收買範圍、住民遷徙等各項事宜，必須再修正，且獲得住民同意才行；（4）今後處理類似事務，需有縣長與縣參事官陪同；其責任在於安撫縣民、順行土地收買工作。[62]

他們向滿洲國最高的日系官吏——身在新京的國務院總務廳長遠藤柳作（1886-1963）呈報意見。[63]遠藤多次出面與關東軍協調，幾番交涉均未果。[64]在無法獲致確切回應的情況下，七名縣參事官乾脆直晤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據親歷其間的人憶述：西尾言談時態度激昂，認定發生聯隊長被殺情事，有損皇軍威信，勢必無法寬待，否則置關東軍的顏面何如？因此力主嚴懲。面對強悍回應，七名縣參事官深感灰心，覺得「賴

60 這五名縣參事官分別是：渥美洋、石垣良隆、濱尾卓次，明石勝利、高橋勝治。其生平見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2、101、890、1058、1585；中西利八編纂，《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頁 66、240；山川隣編，《戰時體制下にかける事業及人物》，頁 866；竹中憲一編，《人名事典「満州」に渡った一万人》，頁 11、97、1154。

61 這是引自明石勝利的說法。滝本實春，《遠い跫音》（高知市：リーブル出版，2003），頁 60。佐倉宗五郎（?-1653）本名「木内惣五郎」，係日本江戶時代一位傳奇人物，據說曾經為民喉舌，幫助重稅的農民向佐倉藩主提出控訴，結果卻遭處刑。

62 滝本實春，《遠い跫音》，頁 62-63。

63 總務廳長即滿洲國實施「次官制」的典型。質言之，當時滿洲國最高官僚為國務院總理鄭孝胥，可是實際掌握全權的是總務廳長遠藤柳作，因此稱之為「最高的日系官吏」。

64 交涉經過見滝本實春，《遠い跫音》，頁 62-63。瀧本更形容遠藤居間的折衝猶如「排球」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維持治安的棟樑、關東軍首腦，竟是如此目光短淺的人物，不免令人心悲」。[65]對於軍方作為，瀧本等認為已脫當初打算為滿洲國「內面指導」的想法，故齊向民政部提出辭呈，[66]以示抗議。

抗議事件雖是一段意外插曲，卻顯示在滿日人對治理滿洲之不同調。如此現象同樣出現於其他日系官僚身上，[67]遑論大同學院出身者。例如：松田俊彦（2 期生，1908-1995）初聞內情，便深受打擊，認為關東軍和部分力主移民滿洲的日人該負起其中疏失責任。[68]夏目忠雄（1 期生，1908-1997）則跟其他現地的縣參事官態度一致，同感應採歸順為

65 滝本實春，《遠い跫音》，頁 64。

66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創立七十周年記念　物語大同学院》，頁 84；藤川宥二，《実録・満洲国県参事官―大アジア主義実践の使徒―》（大阪府堺市：大湊書房，1981），頁 95。

67 像推行「集團部落」的措施，生活在基層社會的三輪健兒認定此舉罔顧縣民利益。以土龍山的處置來說，民政部總務司長竹內德亥（1888-1946）表示「後世史家將訕笑關東軍之愚蠢」；後來才到「北滿」的大原信一（1916-?），也認為「此一現地農民武裝蜂起事件的本質，應為守護農民土地的運動」。相關個案引自森山誠之，〈忘れ得ぬ協力者たち〉，收入社団法人国際善隣協会編，《満洲建国の夢と現実》（東京：国際善隣協会，1975），頁 181-182；石原貞一，〈傷痕の県政〉，收入社団法人国際善隣協会編，《満洲建国の夢と現実》，頁 192-194；滝本實春，〈土龍山事件〉，満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満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150；大原信一，〈ある満州体験〉，《同志社外国文学研究》第 33-34 號（1982 年 9 月，京都），頁 29。三輪健兒是東京人，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畢業，歷任桓仁縣參事官、黑河省理事官等職。竹內德亥係青森縣人，1914 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畢業生，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曾為關東廳理事官、關東廳警視兼事務官、大連民政署長等職。1932 年起，他受到拔擢而擔任民政部理事官暨總務司長，1938 年 7 月成為奉天省次長。日本敗戰後，竹內協助日人救濟事務，是長春日本人會副會長，後遭中共公審槍斃。大原信一係 1937 年 3 月大阪外國語專門學校中國語科畢業生，6 月以陸軍翻譯官角色前往佳木斯點四師團司令部；1949 年擔任同志社大學第一商學部副教授，也是日本中國學會會員。見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257。內尾直昌編，《康德元年版　滿洲國名士錄》（東京：人事興信所，1934），頁 113；中西利八編，《新日本人物大系》，頁 123；嚴紹璗，《日本的中國學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 80。惟嚴著有訛，今據大原回憶文章予以改正。

68 松田俊彦，〈大陸回顧〉，收入満洲国大同学院第二期生大陸回想録編集委員会編，《大陸回想録》（東京：編者印行，1977），頁 61。

臺灣大學 滿洲期刊資料庫

手段。[69]後來官方進行殖民活動與土地買收工作，夏目顯得格外審慎，避免原地農民吃虧。當謝文東母親被憲兵隊捕捉後，夏目忠雄特別將其妥置城內某處，以免外界干擾，由此可見他對土龍山事件之立場。[70]

三、日滿矛盾及其重擬拓殖方針

土龍山的農民反抗及其結果讓殖民者始料未及。七名縣參事官的舉動，終使關東軍體認到移民事業無法一意孤行。為了顧及被殖民者之觀感，嶄新的拓殖政策則應運而生。簡言之，日本的滿洲移民政策就在環顧時勢下，逐漸調整方向，關東軍不再站在主導位置。誠如花井脩治所形容：土龍山事件成為「轉機」，收買土地一事因飯塚朝吾之死，「主體遂從十師團變更移轉至滿洲國」，[71]改由滿方接手善後。於是國務院民政部出面選定相關負責人，動員吉林省內官吏與住民進行談話會「協調溝通」解決問題，亦承認土地價格上漲的事實。[72]

（一）調查地方族群、土地與經濟關係

為了深入瞭解依蘭具體情況，殖民者與滿洲國官方多次積極考察族群及土地關係。以筆者所見，至少有數種報告書出爐，[73]描寫地方概況。

---

69 小原瓢介，《飄々乎》（長野：長谷川書店，1985），頁 44。夏目忠雄指稱其他縣參事官岸要五郎（1901-1945）、山田左兵衛均抱持類似的觀察，說謝文東絕非「共匪」。夏目忠雄是長野縣人，1932 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55 年起參與地方選舉，當選長野縣議員兩期，1971 年當選參議院議員。「小原瓢介」是戰後夏目忠雄回到日本後所使用的筆名。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新訂　政治家人名事典　明治～昭和》（東京：編者印行，2003），頁 478。

70 小原瓢介，《飄々乎》，頁 48-49。據稱謝氏降日時，向夏目忠雄深深鞠躬，感謝其照顧母親。創立七十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創立七十周年記念　物語大同学院》，頁 84。

71 〈日本人移民適地吉林省東北部土地買收經過ノ件（昭和九年六月三十日）〉，頁 103。

72 古海忠之，《忘れ得ぬ満洲国》（東京：経済往來社，1978），頁 63。

73 分別是：劉緒宗《依蘭紀略》（1934）、薛增福《依蘭縣開發略記》（1934）、石井俊之〈吉

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

當中，最值得注意者為「滿鐵經濟調查會」人員石井俊之（1906-?）的調查。

1934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0 日，石井俊之奉命前往吉林省內三姓、勃利一帶農村考察，並撰寫報告書。這份調查報告的篇幅相當長，分四次刊於《滿鐵調查月報》。綜觀內容，有幾點強調之處：首先，描繪「北滿」地理與人文特殊景觀，尤其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如形容「社會剝削者」為地主、工商業者、匪賊，是造成與農民對立的階層。其次提及土龍山農民的「暴動」，有意逕行「定調」，釐清不幸意外的來龍去脈。

該篇長文是這麼敘事的：原本當地社會秩序裡，地主和農民之界線甚為模糊。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人／地關係日漸崩壞，日常生活裡農民深蒙其害，或逃亡他處，或淪為盜匪；地主則受戰亂紛更，未必佇留原地，以致土地產權紛亂。石井俊之描繪依蘭及鄰近農民的生活，視為「封建末期、進入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型態。他說地方上仍施行青田買賣，民眾以糧棧為借貸管道；資本家利用不當方式繼續壓榨農民，獲取利益。[74]因此，一旦日僑前來移墾，面對如此複雜的地權型態，不免產生衝突。相較人／地關係，石井還合理化「外國勢力入侵」之說法，說「一為商品，另一為土地買收型態」，[75]後者

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1935）。石井俊之的報告書刊於《滿鐵調查月報》；劉緒宗與薛增福的書分別收入柳成棟整理，《依蘭舊志五種》（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劉緒宗係吉林省永吉縣人，滿洲國初期擔任吉林省教育廳視學、吉林省第五師範校長、伊蘭師範校長省視學官；薛增福係河北省新河縣人，1920 年來到依蘭，先後擔任吉林省第五師範教師、依蘭中學校長、依蘭縣教育局長等職。兩人生平見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144；依蘭縣志辦公室編，《依蘭縣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頁 994。

74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二）〉，《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 15 日，大連），頁 57、65；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三）〉，《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6 號（1935 年 6 月 15 日，大連），頁 77-78。

75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4 號（1935 年 4 月 15 日，大連），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土龍山「暴動」主因。他剖析箇中理由：滿洲事變造成社會極大動盪，土地價格連帶受到影響，從 1930 年到 1932 年間跌幅即高達五成。故農民在土地被指定為「移民適地」之際，被剝奪感自然滋長。[76]

細究這套陳述，雖言之成理，然內容反映出日本左翼知識分子對農村社會的憧憬。質言之，報告書呈現出 1930 年代在滿日人依社會性質或左派理論，所增添的一項詮釋「滿洲性格」農村之佐證。[77]儘管戰後石井俊之頗自豪一己文字刊於《滿鐵調查月報》，認為這是「科學家的一項榮譽」，[78]惟該調查任務可謂冒著生命危險才完成的。因為石井同行的工作人員，僅有三名翻譯與一支守備隊伍。實際上，石井完全被軍方蒙在鼓裡，並不知曉甫發生的土龍山「農民暴動」，直到調查過程中才漸覺此一衝突的存在。[79]

（二）「買回制度」與「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之確立

接著焦點放在幾次移民會議上，探討事件善後中究竟有哪些「蝴蝶效應」。通過說明其中過程，凸顯日、滿雙方在此的攻防，以及在現實層面考量下提出的肆應之道。

首先 1934 年 11 月 26 日，關東軍在新京召開「對滿農業移民會議」，初步為移民提出解決對策。[80]這次會議總結土龍山招致的混亂及其動搖，也將日本移民的工作推向嶄新階段。關東軍認定「暴動」係一局部事件；為了對蘇聯備戰，移民舉措勢不可免，藉提高日人在滿比重，以人

76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頁 50。

77 有關滿洲國時期地方社會性質的考察，以「滿鐵經濟調查會」左翼思想為主，也是後來「滿鐵調查部事件」爆發之主因。這方面簡要討論見小林英夫，《滿鉄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2006），頁 268-277。

78 石井俊之，《私の回顧録》（金沢市：橋本確文堂，1983），頁 70。

79 石井俊之，《私の回顧録》，頁 65-70。

80 關東軍特務部，〈滿洲農業移民根本方策（案）〉，收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濟調查會編，《滿洲農業移民方策——滿洲拓植株式會社設立方策》（新京：南滿洲鐵道經濟調查會，1936），頁 8-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口優勢來控制滿洲。因此，殖民當局訂定計畫，希望 5 年內移入 2 萬戶，並籌設機構。回應日本要求，1935 年 4 月 22 日滿洲國國務院的民政部地方司遂設「拓政科」，負責執掌拓殖地的調查、開發及監督。[81] 7 月 23 日，拓政科擴大為「拓政司」，由民政部總務司長清水良策（1893-1989）兼任。

現地工作為實施「買回制度」，亦即殖民當局強制收買，將土地所有權收歸公有，俟開拓團前來墾殖時，再以命令要求住民離開。此外，給予農民原地相同面積之荒地，充作「買回地」。1935 年起，實業部指定依蘭、勃利、寶清、東寧、密山等縣，「凡縣城周圍五華里以內的土地不收外，一切土地不論生、熟地都一律收購」，買收價格為每垧（東北土地面積的單位，相當於 10 畝或 15 畝）熟地 2 日圓、荒地 1 日圓。儘管不再收購原地主土地，惟比起事件前則條件更形嚴苛；換言之，一垧土地還不值一斗大米的價錢。[82]

當時概分兩班進行：一為吉林省總務廳長三浦碌郎、科長田中孫平等的「依蘭班」，一由結城清太郎（1894-?）主持的「密山班」。[83]據參與者回憶：當時密山班任務係以「收拾事態」為要，盡可能收買鐵道附近用地。該項工作最為棘手處，係釐清土地的級別及計算方式；每與農民相談時，需分辨熟地和荒地。然滿方財力孔急，無法負擔農民期待，僅權宜發予土地收買票卷。為求進展順暢，時常派遣卡車及飛機運送新京中央銀行的紙幣，以利支付。[84]最後在殖民者強力主導下，密山「全

81 〈彙報・民政部分科規程中改正之件〉，《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334 號（1935 年 4 月 22 日，新京），頁 228；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頁 193。

82 〈羅振邦筆供（1954 年 10 月 27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35。

83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頁 218-219。結城清太郎係山形縣人，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1933 年起歷任滿洲國監察院總務處長、國都建設局總務處長、濱江省總務處長、滿洲國開拓總局長、興農部次長等。人事興信所編，《第十四版　人事興信録》卷下（東京：編者印行，1943），「ユ之部」，頁 9。

84 水野福德、石川伝三、井上実，〈土龍山事件と密山工作〉，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滿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150-151。

臺灣人文與區域研究資料庫

縣耕地面積的八成」盡為收買。辦法是先向地主買通，要求村長、屯長配合，然後施以警察權力，收回農民地契。[85]經由誘利與暴力雙管齊下，「買回制度」終於達成兩縣土地收購工作。

儘管暫時圓滿解決移民依蘭的問題，但殖民當局與滿洲國對土地開發仍有疑慮，還經歷了相互攻防。先是 1937 年 4 月 15 日，新京舉辦「日滿懇談會」，時任新京市長韓雲階（1894-1982）稱收購價格過於便宜，造成基層普遍不滿：「密山縣……被買者頗覺有受矇騙，恐將引起第二次土龍山事件」云云。面對這樣情形，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1884-1948）的回應相當制式化，說併購土地「皆由省、縣地方應可解決」，且縣長、縣參事官居間協調，應無不當情事發生。如此答覆，連第三課長竹下義晴（1891-1979）都私下議論：參謀長說法與實況悖離，密山縣早已部分進行收購。[86]這也使得日、滿雙方需重新擬定拓殖方案。

饒富趣味地，研擬拓殖「草案」還有其時機所在。1937 年春天，日軍刻正思忖進軍華北之際，恰巧為滿洲國的日本移民政策帶來轉機，關鍵人物是駐任天津司令官的香月清司（1881-1950）。香月觀察到：日本積極想在華樹立協力政權，卻屢遭滿洲國內各種購地的負面消息影響。原因係逃奔至華北謀生的關外農民，四處散播日方強購地產的消息，造成普遍民怨。此一「宣傳」無形中帶來偌大殺傷力，職是之故，香月建議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1875-1962）應妥適處理。[87]故隔年夏天，新京召開為期三天的擴大會議，目標是訂立「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簡

85 歧部與平，〈收買開拓用地〉，收入島田三郎等著，公文逸編，《我們在滿洲做了什麼——侵華日本戰犯懺悔錄》（北京：群眾出版社，2016），頁 70-71。惟據「出版說明」所示，本書是「1955 年至 1956 年期間被關押在東北的日本戰犯親筆所書懺悔錄」，後為公安部相關部門所存檔案資料整理而成，必須衡量其中有無情緒字眼或捏造之處。

86 引文俱見田浦雅德、古川隆久、武部健一編，《武部六蔵日記》（東京：芙蓉書房，1999），1937 年 4 月 15 日條，頁 191-192。

87 谷次亨，〈日本「開拓團」和移民的實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8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 202。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稱「基本要綱」），[88]顯然關東軍最終採納該項建議，表示其對於土地收購問題的高度重視。

日滿開拓委員會審議「基本要綱」，確如近人所言，強化了滿方地位，[89]但仍不能忽略這是在關東軍與滿洲國業已達成共識，希望改善收購土地期間使用不當手段引來的怨聲載道之前提下。並且，出席會議人員除關東軍之外，日方幾乎沒有支持制訂「基本要綱」者，倒是「一致主張本要綱是沒有必要的」。尤其間島省次長認為：日本犧牲許多生命和財產而獲滿洲權益，故日僑移民實屬理所當然；加上為了有效解決日本國內人口壓力問題，無需顧慮在滿住民的土地所有權與生活之必要，主張照舊施行政策。滿方當然希望通過「基本要綱」，谷次亨（1898-1977，時為國務院總務廳次長）、曲秉善（時任協和會指導部工作）、蔡運升（時任外務局長）、羅振邦（時任經濟部商工司長）等人均以維護「民族協和」精神及農民立場而論。就在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1886-1967）裁量下，會議結果以「決不能在滿洲實行移民政策的手段不當，而影響了日本的前進」，拍板定案。[90]

但此非最終結果。一年後，1939 年 6 月 30 日，東京首相官邸召開「日滿開拓審議會議」，追認「基本要綱」草案。會議係由兩國派員參加，日本代表為加藤完治，其力持既有的移民辦法。滿方參加者則分別被賦予各種任務發言，[91]比較特別者為谷次亨。谷氏嘗對拓殖引發族群衝突，提出檢討。他主張移民應做到「民族協和」，以「相互謙沖的情

88 有關「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全文內容，收入「滿洲開拓民ニ関スル根本方策ニ関スル件ヲ定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2030129100、公文類聚・第六十三編・昭和十四年・第六十一巻・外事三・国際三・通商・移民・雑載（国立公文書館）。

89 小都晶子，〈日本人移民政策と「満州国」政府の制度的対応—拓政司、開拓総局の設置を中心に—〉，《アジア経済》第 47 巻第 4 号（2006 年 4 月，東京），頁 12。

90 其中過程均引自谷次亨，〈日本「開拓團」和移民的實況〉，頁 203。

91 譬如盧元善被結城清太郎指派任務，需「在開拓會議席上要求急速大量移民，不然預備大量的土地都撩荒了」一類的話。〈盧元善筆供（1954 年 5 月 14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頁 306。

臺灣人學術研究資料庫

懷」為原則。[92]意外地，代表關東軍立場的片倉衷竟也附和其詞，惟說法甚為迂迴：

> 關東軍是日本的關東軍，而不是滿洲國的關東軍。關東軍是領導滿洲政府推行各種政策；推行的政策結果好壞，是關東軍的責任，也就是日本政府的責任。現在日本政府正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時期，決不應該在滿洲國為了實行一種移民政策，用了一種粗暴的手段，而影響了日本前進的全局，這是不可取的。谷次長所說的情況，是絲毫不錯的，關東軍也是那樣了解的。正因為是那樣的情況，關東軍才命令開拓總局，根據關東軍的意向而擬定本要綱草案。希望日本朝野的各位，為日本的前進全局著想，對於本要綱的看法，再加以考慮，這是關東軍的盼望。[93]

由片倉的言論推知：關東軍正處於一既特別又曖昧的位置，既要肩負承擔日人移民滿洲政策的風險，又要顧全日本帝國身為殖民者的門面。最後「基本要綱」遂獲通過，不再全以日本為考量，[94]並訂出法源依據、行政機構等事宜。但嚴格說來，1939 年公布「基本要綱」已無濟於事，以「開拓」之名行「掠奪」之實早成定局，因此谷次亨認為「絲毫沒起作用」。[95]

---

92 谷次亨，〈開拓民と原住民〉，《東亞聯盟》第 2 卷第 2 號（1940 年 2 月，北京），頁 268；谷次亨，〈お互ひ謙虛にそして眞劍に〉，《開拓協和》創刊號（1940 年 10 月，新京），頁 11。谷次亨係出生於關東州普蘭店，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 年 9 月進入滿鐵工作，歷任滿洲國國務院稅務廳人事審調查科長、文教部囑託、安東省公署教育廳長、國務院總務廳次長、民生部大臣等職，曾被視為未來總理人選。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448；寺尾正一，〈谷次亨氏の運命〉，收入文藝春秋編，《されど、わが「滿洲」》（東京：株式会社文藝春秋，1984），頁 95。

93 引文來自谷次亨，〈日本「開拓團」和移民的實況〉，頁 204，個別標點偶有更易。片倉衷個人日後的憶述約略提到會議內容，惟更強調「民族協和」原則。片倉衷，《戰陣隨錄》（東京：経済往來社，1972），頁 309。

94 改成「日滿兩國一體的重要國策」。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頁 352。

95 谷次亨，〈日本「開拓團」和移民的實況〉，頁 205。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四、「農民抗日大軍」在意識形態中的角力

土龍山事件除標誌日本對滿殖民陷入困局外，也是一場「新戰爭」之開端。若將 1939 年 3 月謝文東投降視為里程碑，這場約達五年的軍事圍剿中，對抗「討伐」的作戰型態不再限於正規形式，[96]而是採取多方運用、化整為零、四處襲擊的游擊戰術。更值一提，抗暴行列還充斥國族主義與情感的色彩，經由宣傳被提升至意識形態之場域，話題直迄戰後仍斷斷未休。

（一）匪賊的「政治化」標籤與東北抗聯

滿洲政權建立後，為了弭平各地反抗，殖民當局刻意在掃蕩過程裡淡化國族意識，宣稱他們面對的不是「抗日者」，而是「匪賊」。不僅如此，為了賦予剷除這些抗日勢力的正當基礎，殖民者的辦法是增添其「成分」；就像官方所宣稱的，「匪賊」開始有新的惡化色彩，且與蘇聯、朝鮮人組織的共產黨有關。[97]正如學者所言，原本一場為了移民事業的土地徵用，結果不獨改變地主階層和富裕農民的基礎，也讓民眾權益受損。至於飽受生存威脅的滿洲農民，後來更鳩集成「抗日大軍」，竟開啟中國共產勢力發展之序曲。[98]

據組建東北共產游擊隊的李延祿（1895-1985）陳述，土龍山效應猶如星火燎原，「是我們初意還沒有料到的」。[99]雖然許多共黨成員甚為關切謝文東一行人動向，咸認這股武裝勢力不容忽視，但究竟該如何面

96 國，〈戰鬥中的東北抗日聯軍〉，收入松五等著，夏行編，《東北抗日聯軍游擊實錄》（漢口：上海雜誌公司，1937），頁 70-72。

97 這些說法引自田伯烈，〈「滿洲國」視察記〉，頁 9-10；H. J. Timperley, “Japan in Manchukuo,” *Foreign Affairs* 12, no. 2 (January 1934, New York), pp. 304-305.

98 小林英夫，《帝国日本と総力戦体制：戦前・戦後の連続とアジア》（東京：有志舎，2004），頁 24。

99 李延祿口述，駱賓基整理，《過去的年代——關於東北抗聯四軍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頁 23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眾人實互有異見，一時頗為躊躇。尤其謝的地主身分，更令某些黨員深惡痛絕。如密山縣的朴鳳南（1907-1936）便反對合作，揚言「扶助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實際上扶助了謝文東的地主武裝勢力」，身為「共產黨的部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和地主武裝發生協作關係」。[100]換句話說，謝氏係共黨認定的資產階級，就算同為抗日立場，也不該與之為伍。這顯示地方共黨成員間的意見相當紛歧。

然此情況卻在 1934 年 7 月底有了變化。首先，被圍剿的民眾救國軍幾乎已達彈盡援絕之地步，人數僅剩 800 餘名。謝文東帶領殘餘隊伍流竄依蘭縣來才河、四道河子和第二區一帶，始終處於挨打局面。接著 9 月，中共對滿方針也出現重大轉折。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楊松（1907-1942，化名「吳平」）由蘇聯邊境潛入，以推動、建立黨組織及擴大統一戰線為目標。楊氏以共產國際巡視員的身分考察密山、穆棱、勃利、安寧等地，籌建滿洲省委員會（簡稱「中共滿洲省委」）的吉東局特別委員會。[101] 10 月 10 日，民眾救國軍在樺木崗遭關東軍襲擊，謝文東率十餘人突圍，躲入深山密林之中。同一天楊松更以中共吉東局的名義發出指示，要求「動員黨和群眾組織的一切力量，聯合一切反日隊伍，鞏固和擴大反日統一戰線，以擊潰日滿匪軍的討伐」。[102]

---

100 李延祿口述，駱賓基整理，《過去的年代》，頁 238-239。朴鳳南原名金萬興，是朝鮮族。1912 年隨父親從朝鮮咸鏡北道移民到吉林省和龍縣，1930 年 6 月加入共產黨，1933 年 10 月任中共密山縣委書記。雞西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雞西市志》下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頁 1327。

101 Anthony Cooga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PhD diss.,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1991), pp. 177-208. 楊松原名吳紹鎰，湖北省黃安縣四姑墩（現改屬禮山縣）人。他於 1923 年開始閱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1926 年 8 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 年 1 月，由中共青年團中央介紹，楊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兩年後畢業。1931 年春至 1933 年夏，他在海參崴太平洋職工會擔任中國部主任之職，並負責編輯《太平洋工人》雜誌。1934 年 7 月，楊松受中共派遣，前往東三省進行地方黨部工作，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任省委巡視員及吉東特委書記等職。

102 楊松，〈中共吉東局致饒河中心縣委的信（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收入氏著，劉晶芳編，《楊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67。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死存亡繫於一線的謝文東，不獨茫茫滄海中找到浮木，也讓本來欲振乏力、毫無起色的中共滿洲省委注入一股活力，從而得以大展身手。打著「聯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滿洲各地游擊隊無論信仰共產思想與否，開始「相互聯絡，通過比較統一的軍事與政治領導，避免日寇離間和破壞的陰謀詭計」。[103] 1935 年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中國共產黨駐蘇代表王明（1904-1974）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成為指導方針，且基於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考量，再也不反對吸納其他非共的武裝組織。1936 年的「一・二八事變」紀念日，東北抗聯的臨時政府與總司令部正式成立，公推李杜（1880-1956）為總司令。[104] 9 月 18 日轄下第八軍成立，任命謝文東、滕松柏（1883-1944）為正、副軍長，由劉曙華（1912-1938）擔任政治部主任，共編有三師十團。[105]

東北抗聯的人數、成軍單位，向來說法不一。依筆者所見，甚至劃分到二十二軍（詳表二）。此外，儘管業經肅清，東北抗聯的兵力早已減少許多，然素質卻有所提高，且行動上極為活躍。[106]為了遏止共產勢力在滿洲國內孳生，日本與關東軍密切監控，非惟注意其消長，還試圖進行各種離間、分化之策略。

103 李延祿，〈東北抗日義勇軍最近活動狀況〉，《大聲》第 11 號（1937 年 4 月，上海），頁 7。相關討論見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89-228.

104 據關東軍內部出版資料，東北抗聯係由趙尚志為總司令，李華堂為副司令。滿洲國軍政部軍事調查部編，《滿洲共產匪の研究　第一輯》（新京：編者印行，1937），頁 774-777。

105 〈劉曙華給志如兄的信——報告八軍工作及敵情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 46 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頁 316。劉曙華是山東省濟南人，歷任中共密山縣委書記、東北抗聯第五軍第二師及第八軍政治部主任等職。黑龍江省樺南縣志辦公室編，《樺南縣志》，頁 956-958。

106 滿洲國治安部著，吉林省公安廳公安史研究室、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編譯，《滿洲國警察史》（長春：編者印行，1990），頁 174。

臺灣人學社科期刊資料庫

表二　東北抗日聯軍情勢表

軍及軍長		活　動　地　方	兵力其他備考	備　註
第一軍	楊靖宇	安東、長白、莊河、撫松、通化、臨江、岫岩、柳河、寬甸、東豐、清源、鳳城、磐石、濛江	20,000 餘人	
第二軍	王德泰	延吉、琿春、汪清、和龍、敦化	16,000 人	
第三軍	趙尚志	賓縣、延壽、葦河、方正、珠河、阿城、雙城、榆樹、通河、鳳山、肇東、望奎、巴彥	15,000-16,000 人	
第四軍	李延祿	方正、依蘭、穆棱、樺川、勃和、密山、虎林、饒河、富錦、寶清、同江、綏遠	約 15,000 人	
第五軍	周保中	寧安、穆棱、東寧、蛟河、安圖、長白、撫松	約 17,000 人	一說以吳義成為軍長
第六軍	夏雲階	綏遠、同江、富錦、渦原、蘿北、通河、佛山、鳥雲	14,000 人	一說以謝文東為軍長
第七軍	陳榮文	虎林、饒河	約 10,000 人	一說以夏雲階為軍長
第八軍	王亞臣	五常、榆樹	約 12,000 人	
第九軍	李華堂	依蘭、勃利	10,000 人以上	
第十軍	樂天林	熱河、阜新	10,000 人以上	
第十一軍	閆新闕	岫岩、西豐	約 12,000 人	
第十二軍	趙作華	新民、法庫、黑山	10,000 人以上	
第十三軍	賈明倫	建平、朝陽	約 13,000 人	
第十四軍	孫寶鼎	柳河、輯安、安東北部	約 14,000 人	
第十五軍	張甲州	建平、朝陽	約 12,000 人	
第十六軍	閻生堂	安東	約 15,000 人	
第十七軍	白君實	江省一帶	10,000 人以上	
第十八軍	趙慶吉	磐石一帶	10,000 人以上	
第十九軍	羅明星	舒蘭、德惠、樺甸	20,000 人以上	
第二十軍	吳義成	安圖、撫松、磐石	10,000 人以上	
第二十一軍	梁　廣	圖門江一帶	約 35,000 人	
第二十二軍	謝文東	勃利、虎林	約 20,000 人	
湯原游擊隊				
海倫游擊隊				
額敦游擊隊				
伊通游擊隊				
五常游擊隊				
撫松游擊隊（司令薛茂山）				

資料來源：〈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狀況〉，《外事警察報》第 177 號（1937 年 4 月，東京），頁 126-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謝文東降日的抉擇

謝文東坐享土龍山光環的效應，對東北抗聯的各項「合作」事宜卻始終維護一己之權益，因此彼此的矛盾終究難免。有兩次衝突可明其梗概。第一次是 1936 年 11 月，謝部團長田奎遭第三軍繳除武裝，引來第八軍抗議；謝文東要求「將槍枝交還本軍，同時要求他們關於繳除武裝之正當理由給本軍以答覆。如不交還，提交東北抗日總會解決之」。[107]第二次衝突於 1938 年 6 月，第八軍因幹部教育及其管理欠佳，遭周保中（1902-1964）批評，說謝氏對「中國共產黨政治領導不但不忠實，而且有利用來做私圖便利、違反全民統一戰線進展的企圖」，泰半屬於「投機取巧」的行為，又「保存著封建反動領導，不顧抗日救國每個戰士利益表現」。[108]對照第八軍屢次違犯紀律、無法適時糾彈的情況，周保中甚至於某次會談「憤然而返」。[109]

實際上，細究謝文東及其部屬作為，他們的「抗日」之舉與其說充滿國仇家恨情懷，毋寧僅是一種「被創造」的形象。無論走上反抗殖民者之途，還是高舉著義勇軍旗號，多少都缺乏人性的真實面，忽略當中「為求生存」的動機。幾處案例有助於吾人理解謝氏處境。首先，進行「討伐」工作時，地方基層未必真如中央政府那般堅守政策。如依蘭縣「湖南營」武裝移民團員、富山縣出身的東海某，將原屬謝文東的土地頂讓給朝鮮人耕種，又把移民團內的步槍、子彈移交隸屬東北抗聯第八軍系統的「東亞隊」。從繼續保有土地、武力的角度而言，第八軍謝部並未真正失去其地位；且武裝移民團員有此措施，「不但避免了謝文東

107 當時第三軍軍長趙尚志與田奎團部發生爭執，要求解除武裝。〈東北抗日聯軍第八軍軍部關於最近工作計畫決議草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 46 冊，頁 310。個別標點與文字偶有更易。

108 〈周保中關於三、八兩軍的關係問題給劉曙華同志信（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 52 冊，頁 45。

109 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9 年 7 月 8 日條，頁 186。

臺灣人權學術網路資料庫

的攻擊，反而還保持了連絡」。[110]

其次，可從謝文東投降一事來看。事件前曾與謝氏謀面的白土五郎，後來多次委託他人轉達私會，試圖誘降，惟謝雖願溝通，卻對「歸順」始終抱疑。真正迫使謝氏改變初衷，是關東軍施展懷柔策略，致使身旁一連串友軍的招撫奏效後，造成孤立感而被迫投降。1937 年 3 月起，殖民當局便開始「在大和鎮建立懷柔抗日軍的基地」，勸誘 600 多名第八軍士兵前往寶清縣城解除武裝。[111]直到 1939 年 3 月，謝文東在各方求助無門之下，決定私派長子謝成發、心腹姜永茂進行談判；17 日，率眾部下 3,000 多名投降。[112]日後謝向人吐露心曲：

> 日本人派去聯絡人員勸我們下山的時候，我原來表示堅決不下山，死在山裡算了。可是我們衛隊長姜永茂心活了；戰士大多數也跟他一個心眼兒。最後我一看：如果再不答應的話，我身邊也很受威脅，因此我算是被迫下山的。[113]

不管謝氏一語的可信度如何，吾人得以想見：他是在攸關性命、幾經忖量後決定不戰而降。因此，謝的行止無疑以「生存至上」為前提，完全符合人性面，遑論殖民當局多次招撫及優遇。

「歸順」後的謝文東，想當然爾成為指標性人物，殖民者據此而大肆宣揚。包括任命謝氏為協和會中央本部囑託外，警務司長渋谷三郎（1888-1945）亦特地設宴款待，並由孫仁軒（1895-?）帶領謝前往忠靈

110 〈白土五郎筆供（1954 年 9 月 15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東北「大討伐」》（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416。

111 〈白土五郎筆供（1954 年 9 月 15 日）〉，頁 416。

112 〈日向幸夫口供（1954 年 12 月 13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東北「大討伐」》，頁 419。日向當時是第七十聯隊第三大隊第十中隊長，駐紮在依蘭縣永發屯，參與該次談判。惟親歷者對外公開說法，謝成發、姜永茂兩人是在依蘭近郊被日滿軍警逮捕。新沼勝三郎，〈更生した綠林の王者·謝文東〉，《雄弁》第 30 卷第 7 號（1939 年 7 月，東京），頁 180。

113 郝益之，〈我對謝文東的耳聞與眼見〉，頁 265。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臺灣人口學術期刊資料庫

塔「跪拜請罪」，[114]照片更於各媒體上登載。宣傳重頭戲是 1939 年 3 月 31 日的「謝罪旅行」，謝文東率家人、親信從佳木斯經空路抵達新京。這趟旅行傳遞出更多的政治意涵，報導描寫謝氏初見滿洲國國都之際，對其市容整備充滿著驚訝與讚嘆；[115]此外，又拜訪國務院總理張景惠（1871-1959）及總務廳長官星野直樹（1892-1978），謝談話裡「表示恭順之意」。報載他的態度是歷經幡然悔悟後，「徹底瞭解王道國家真髓」；當張予以溫情贈言後，謝則答「將來企以此再生之餘命，努力為新國家效力」。[116]

屬於謝文東的政治表演不僅於此。有關移民問題，他儼然成為代言人，受邀至大同學院現身說法，又參加座談會。[117]除了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親授名譽軍刀外，謝氏更在治安部事務官渡邊政雄（1918-?）陪同下，到土龍山附近飯塚墓前參拜。[118]日本帝國還隆重地安排謝文東前往「內地」旅遊，並參詣「滿蒙開拓移民之父」東宮鐵男的墳墓，有的媒體乾脆賦予謝氏「更生的綠林王者」封號。[119]在充分予以酬庸、安撫

114 高丕琨，《偽滿人物：偽總理大臣秘書官的回憶》（長春：長春史志編輯部，1988），頁 243-244。孫仁軒係關東州普蘭店人，1919 年旅順師範學堂畢業，曾任吉林鎮守使翻譯官；滿洲國時擔任延吉警察廳長、吉林警察廳長、治安部理事官、警務司保安科長等職，戰後被槍決。據聞滿洲國上層官吏對孫氏不抱好感。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頁 656；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799；高丕琨，《偽滿人物：偽總理大臣秘書官的回憶》，頁 197。

115 新沼勝三郎，〈更生した綠林の王者・謝文東〉，頁 182。

116 〈謝文東投滿洲　已由佳木斯赴新京謁見〉，《天聲報》（北京），1939 年 4 月 14 日，第 1 版。

117 冷鐵錚，〈日本對東北的武裝移民和中國人民的反移民鬥爭〉，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8 冊，頁 212。冷氏自承 1938 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隨即進入大同學院。惟據名單，應為 1939 年 5 月畢業的第 10 期院生，且謝文東為 1939 年 3 月投降，故可推定該次移民座談會大約是在 4-5 月間。

118 新沼勝三郎，〈更生した綠林の王者・謝文東〉，頁 183。

119 新沼勝三郎，〈更生した綠林の王者・謝文東〉，頁 178-183；山下武男，〈謝文東が歸順するまで〉，《協和：滿鐵社員會機關誌》第 241 號（1939 年 5 月，大連），頁 22-25。參訪東宮鐵男墓地的故事，可見澤地久枝，《もうひとつの滿洲》（東京：文藝春秋，

臺灣人文數位資料庫

謝氏生活的同時，也強化了滿洲國與殖民當局的統治合法性。

五、境外敘事、宣傳及戰後形象的變遷

也許土龍山的傳奇故事就該在此落幕了，但謝文東身為「叛徒」（周保中語）的烙印並未這樣劃上句點。他那「為日賊特務走狗工作」的形象，[120]還持續地蔓延，構建一段淡去抗日光輝的過去。

（一）抗日凝聚力與土龍山題材

土龍山事件發生未幾，關內的中國民眾彷彿得到偌大勇氣，足以對抗具現代化優勢的日本。當大家還不知依蘭縣究竟在何處時，黃炎培（1878-1965）於上海青年會的場合特意介紹。1934 年 5 月 26 日晚間，黃氏在一場以「華北當前的危機」為題的演說中，[121]盛讚縣民的英勇事蹟。他自承 1918 年「去過一次」，並謂「依蘭有兩大姓，人口鼎盛，且都很有志氣，也有在外做官的，因此知識很開通，精神很團結」；對當地民眾的抗日之舉，「報紙稱日人還贊歎民眾犧牲壯烈」，故黃遽下結語：

> 我們求生，須得不怕死。只要全國團結，像依蘭民眾一樣，總可以戰勝一切，使敵人畏服。[122]

無論黃炎培觀察依蘭百姓真確與否，[123]其演說緊扣時事，吸引大眾，藉

1986），頁 86。

120 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1939 年 7 月 8 日條，頁 377。

121 黃炎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 4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1934 年 5 月 26 日條，頁 279。

122 〈華北當前的危機（續）：黃炎培在上海青年會演詞〉，《大公報》（天津），1934 年 6 月 17 日，第 4 版。黃氏稱「依蘭有兩大姓」，顯然並不清楚三姓地名的由來。

123 黃炎培是在 1918 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10 日偕蔣夢麟赴東北調查，分別經過朝鮮新義州、首爾、仁川，之後抵達大連、長春、吉林、哈爾濱。據日記所示，黃氏於 7 月 20 日晚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

由土龍山壯舉激勵民心，是無庸置疑的。同樣站在國民政府立場，謝文東等人被冠以「義軍」，尤其「只憑一身的血肉來拼」之精神，要日本軍隊配合動員優勢才足以克服，印象可說深植人心。[124]

中日戰爭爆發前夕，謝文東與土龍山的題材也成為各界凝聚抗日決心的堅石。在廣大鄉村，有份〈精神講話資料〉向農民宣導，稱「只有團結抗日，才能避免這樣的災難」。這份材料很可能出自滿洲共產黨員的指導綱要，不僅歸納土龍山農民後來失敗之處，還分享共同抗日、統一戰線及分散游擊等作法。為了吸引民眾，〈精神講話資料〉編織一首歌謠，以「明白日本人在東北怎樣橫行」：

> 大千末劫已來到，怎麼跑也怎麼逃？山中有家歸不得，城裡多產也空勞。豬鼠年，鬼神號；鐵牛滾，火鴉叫。天翻地覆海花笑！這般禍，何時了？多少房屋成灰燼，只剩鋤頭和鐮刀！[125]

此一資料最末增列「討論」項目，嘗試回答「東北農民有沒有活路」、「土龍山農民的失敗在哪裡」等問題。[126]

路過三姓（即依蘭），兩天後拜訪東益、致遠、東井等墾務公司，後寫有〈東井墾地概況〉一文。黃炎培，《黃炎培日記》第 2 卷，1918 年 7 月 20-22 日條，頁 20；黃炎培，〈東井墾地概況〉，《教育與職業》第 9 期（1918 年 10 月，昆明），頁 1-8。

124 類似說法摭拾可見，如雅瑪，〈土龍山的血花〉，《大公報》（天津），1934 年 6 月 5 日，「惜夢附記」，第 12 版；〈抗日消息・謝文東實力雄厚・日陸軍海空軍聯合進攻〉，《東北通訊》第 2 卷第 10 期（1934 年 6 月，北平），頁 4；〈東北消息・東北義軍近況〉，《外交週報》第 2 卷第 1 期（1934 年 7 月，北平），頁 11；〈抗日消息・謝文東圍攻依蘭縣・擊斃偽軍四十名及日籍教官西山〉，《東北通訊》第 2 卷第 13 期（1934 年 8 月，北平），頁 3-4。

125 〈東北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戰時農村宣傳資料》第 1 輯（1938 年 7 月，漢口），頁 10。這段宣傳並非只有在一處刊載，另見〈精神講話資料・東北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溆浦教育》第 1 卷第 26-27 期（1938 年 7 月，溆浦），頁 21-23。

126 有關檢討土龍山農民失敗，該文所提出的辦法包括：（1）立刻派人聯絡其他村莊共同抗日；（2）設法送消息給抗日義勇軍，請他們援助；（3）不能作戰的婦孺先行退出；（4）分出人去游擊。他們沒有做到這些，等在莊子裡挨打，當然吃虧。見〈東北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民間社會最轟傳一時的，係于浣非（筆名「宇飛」，1894-1978）所寫之劇本。[127]作者本為黑龍江省賓縣人，「九・一八」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結果因日本憲兵隊在哈爾濱四處搜捕，潛逃至北平。[128] 1936年，于氏發表劇本《土龍山》，廣受注目，嗣後上海和南京的戲劇社團常以此一題材表演。[129]最著名事例是委員長蔣介石（1887-1975）遭遇「西安事變」，歷經脫險安然歸來，首都南京的斯盛中學即以土龍山為題，公演愛國劇做為慶祝。[130]儘管有讀者投書指證該劇本係倉促完成，內容不免有「魯魚豕亥」之訛，嗣後于氏也為文更正，[131]但都無損人們對土龍山的既定印象。

（二）「活捉、處死謝文東」

即使謝文東早在 1939 年 3 月便投降殖民當局，但抗戰期間其名聲仍與趙尚志、李延祿等東北抗日游擊部隊的將領齊名，是眾人歌頌的英

127 宇飛，〈土龍山〉，收入光明半月刊社編，《東北作家近作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頁 21-45。

128 〈東北文藝作家近況〉，《大公報》（重慶），1940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于浣非後來曾在由張學良出資的《大光報》充當經理，並在東北抗日救亡總會工作，嗣後又在大後方成都的教育廳擔任衛生施教工作。

129 相關報導有如下：施超，〈「土龍山」〉，《大公報》（上海），1936 年 11 月 5 日，第 12 版；沙哥，〈劇壇消息〉，《大公報》（上海），1936 年 12 月 6 日，第 12 版；陳凱，〈一九三六上海國防戲劇的演出〉，《大公報》（上海），1937 年 1 月 1 日，第 21 版；〈惠風劇社成立〉，《大公報》（上海），1937 年 4 月 4 日，第 16 版；馬翎，〈正行女中四週遊藝會記〉，《大公報》（上海），1937 年 6 月 13 日，第 14 版。

130 〈中學新聞・斯盛初中〉，《大公報》（上海），1936 年 12 月 31 日，第 8 版。

131 當土龍山的劇本問世之際，有讀者發現副標題「一九三四年的深秋」與內容並不相符。內文中寫道「前五年的九月十八日，敵人佔了我們的東三省」，事實上 1934 年離「九・一八」事變不過才三年光景。這位名叫「龔熙民」的讀者，文末說「這一個問題難解得很，還是請宇飛先生自己，或光明的編輯先生來解答吧！」後來于浣非對此提出更正聲明。見龔熙民，〈「土龍山」裏一個疑問〉，《立報》（上海），1936 年 12 月 5 日，第 6 版；宇飛，〈關於「土龍山」〉，《立報》，1936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

臺灣人學術網路資料庫

雄。[132]職是之故，戰後至國共內戰初期，謝文東的降敵行為並未使其落入漢奸罵名，反倒由於自身在地的武裝實力，成為國民政府極力籠絡的對象。他以「反共」為號召，糾集 3,000 民眾在勃利縣活動，[133]並投效於東北行轅麾下，被任命為國民黨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第五戰區中央先遣軍的第三軍軍長、新七軍八十五師師長等職。所以謝氏個人軼事廣泛流傳，坊間猶視如正義之師。[134]

可是這些都在中共控制「北滿」後豬羊變色。押錯寶的謝文東變成過街老鼠，被迫再度流竄於松花江沿岸一帶。在施行「土地改革」期間，謝氏又淪為批鬥對象，身分既是地主也是土匪。有意思的是，左翼陣營人士開始細數謝文東變節、投入滿洲國協和會、「大肆廣播頌揚日人」等諸多惡狀；[135]共產黨則把這位昔日盟友的「叛徒」，看作眼中釘一般亟欲剷除。參與圍剿行動的賀晉年（1910-2003）回憶：「合江地區各股土匪中，謝文東的勢力最大。……因此，首先把他消滅，就等於砸爛了蛇頭。」[136]而描寫謝氏性格方面，共黨予以「污名化」，說他舉凡任何

132 例見李文襄，〈暴日在東北施行殖民地土地政策的反應——東北抗日的武裝農民領袖謝文東的故事〉，《東北論壇》創刊號（1939 年 1 月，重慶），頁 18-20；周之風，〈故園東望腸堪斷　況復今夕是歲除　總反攻勝利年與東北〉，《大公報》（桂林），1941 年 12 月 31 日，第 3 版。

133 外務省管理局引揚課，〈東安省概況〉，見《滿洲省別概況（一）》，收入加藤聖文編，《海外引揚関係史料集成（国外篇）》第 25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 63。

134 〈謝文東等部曾攻入寧安〉，《前進報》（瀋陽），1946 年 9 月 12 日，第 2 版。《蘇州郵刊》刊載一則軼事，乃未經發行的新郵票。該郵票據傳謝文東被殺害後，其部下副官夫人以為見方紙包係為紙幣，故密藏車底而攜出。文中全篇描述謝氏抗日經過，結論為：「在文化郵票社交換會上，得與郵壇人士相見面。豈謝之忠魂，默庇而使然歟！」王侶芝，〈謝文東抗日討共始末記〉，《蘇州郵刊》第 2 卷第 5-6 期（1947 年 12 月，蘇州），頁 61-62。

135 劉白羽，〈敬話東北英雄——為第十四個「九一八」而寫〉，《新文化半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46 年 9 月 25 日，上海），頁 25。

136 賀晉年，《深山剿匪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頁 54-55。這些「政治土匪」被形容為地頭蛇，而謝文東正是「蛇頭」。相關情況見蔡少卿主編，《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頁 115-12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行動都取決於問神卜卦，凸顯個人充滿迷信色彩。[137]於是在圍堵匪賊前提之下，「活捉謝文東」等於讓謝「走下聖壇」，更增添中共的聲望。

1946 年 11 月 20 日，經東北民主聯軍三五九旅多方追剿下，終於在依蘭縣山區捉獲謝文東。《東北日報》立刻以斗大的雙重標題——「民族叛徒」及「中央胡匪」概括謝氏生平，公布他被捕的消息。[138] 12 月 13 日，謝匆匆被帶至勃利縣進行全民公審，且火速處以死刑，[139]留有照片存證。地方百姓為此編織了一首歌謠，顯露當中微妙關係：

> 謝文東瞎胡鬧，民主聯軍打得妙。小鬍子投了降，大鬍子活捉到。你們有功勞，我們哈哈笑！[140]

等到 1949 年中共建政後，謝文東也就不折不扣地變成負面形象的化身。為了慶祝「新中國」到來，有人建議改造皮影戲，利用當地的真人真事「重新創作」與宣傳，曲折且富有故事性的「活捉謝文東」自然成為首選，尤符現實意義。[141]劉白羽（1916-2005）則在《光明照耀著瀋陽》一書中，聲明殲滅謝文東乃屬歷史偉業，甚至被喻為連「神也做不到的事」，卻在人民自己的努力之下完成。[142]謝文東宛若墜至十八層地獄，列入地方志書的「歷史罪人」項目內。[143]幾種攸關滿洲國的史冊，對這位昔日

137 譚蔭縛，〈搜山—活捉匪首謝文東記—〉，《東北日報》（瀋陽），1946 年 12 月 18 日，第 4 版。後來該文重刊於中共佳木斯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合江剿匪》（佳木斯：佳木斯人民政府鉛印室，1988），頁 110-111。譚蔭縛時為合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更詳盡的內容，可見賀晉年，《深山剿匪記》，頁 58-73。

138 〈民族叛徒中央胡匪謝逆文東就擒　其匪部完全肅清人民額手稱慶〉，《東北日報》，1946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139 〈慶祝剿匪勝利　槍決謝逆文東　決心活捉李華堂孫榮久〉，《東北日報》，1946 年 12 月 14 日，第 1 版；賀慶積，〈槍斃謝文東——三五九旅北滿剿匪紀聞〉，《黨史縱橫》1997 年第 2 期（瀋陽），頁 31-32。

140 賀晉年，《深山剿匪記》，頁 76。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141 陳正，〈談改造皮影戲及舊藝人〉，《戲曲新報》（北京），1949 年 9 月 23 日，第 2 版。

142 凌迦，〈人民・新英雄〉，《大公報》（上海），1949 年 11 月 19 日，第 6 版。

143 黑龍江省樺南縣志辦公室編，《樺南縣志》，頁 97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抗日英雄」刻意淡化，甚至抹殺其事蹟。[144]謝氏功過被定調後，民間仍流傳其軼事，惟未脫他身為「土匪」的模樣。某位論者形容「謝文東終其一生曾兩次當土匪」，一次被逼上梁山，另一次是自願的，只有抗日歲月那段堪稱為「功莫大焉」。[145]饒富興味的是，「遺華日僑」間也有謝文東扶弱濟幼的題材，故事強調謝氏與家人對戰後日本僑民多方照料，「總給他們吃的，在家裡收容他們」；不少難民願將病人、孩子託留，謝再將之分給部下或親屬寄養。[146]同一事件與人物，卻在不同群體及時間點上擁有多元的解讀。

結　語

土龍山事件雖為日本殖民滿洲的一段歷史小插曲，但影響層面之廣，早已脫離帝國原先的想像。然而，後人論及事件始末，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場評斷。本文主要利用相關史料檢視其中「蝴蝶效應」的影響，希望以長時段來進行理解。

受到 1930 年代全球經濟恐慌所致，日本國內面臨農村破產危機，促

144 筆者以中國官方動員編寫的《偽滿洲國史》為例。該書最初在 1980 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印行兩次，共三萬冊；嗣後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1991 年大連出版社再度修訂並與日本合作發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兩種版本都將土龍山事件劃分成「農民武裝暴動」，且謝文東不在「抗日英雄」之列。有關本書原委說明，見俞慈韵，〈研究日本侵華、解剖殖民地需要大著——《偽滿洲國史》編後〉，收入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大連：大連出版社，1990），頁 661-670。

145 王躍斌，〈擊斃飯塚大佐〉，《歲月》2012 年第 12 期（邯鄲），頁 24。必須指出，這是以「小說」形式進行的說明。

146 有位居住於土龍山附近、名叫「王慶忠」的遺華日僑，據傳父母被蘇軍襲擊喪命，後來被中國民眾收養，而謝文東居間幫忙甚多。橫川次郎著，陸汝富譯，《我走過的崎嶇小路——橫川次郎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1），頁 118。所謂「遺華日僑」，係指二次大戰後因各種因素被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其中又以留在東北地區者最多。相關討論見林志宏，〈兩個祖國的邊緣人：「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與性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4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45。

臺灣人博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關東軍將移民計畫納入滿洲的整體軍事考量中。只不過身為「非正式帝國」之一環，日本移民滿洲情況不盡如英、法等國的拓殖模式，反以「保護公民」為由，糾合「武裝部隊」為前驅，[147]通過強制收購土地，確保移民生存空間。但這項作法並未考量當地住民的感受，故而招致武裝抗爭。誠然，日本帝國向外擴張之舉，曾引來各地異文化、不同族群及基層社會的反抗，[148]土龍山起事僅係其中零星個案。惟不同於先前者，該事件增添了其他變數，最特別是來自當局內部日系官員對治理原則的質疑。如本文所述，殖民當局高壓擺平了縣參事官的抗議，並經由法令制訂避免滿洲國方面質疑，惜仍未徹底阻遏反對勢力之滋長。它點出統治者的矛盾情結，也凸顯日方移民政策的困窘。因此，隨著調查工作開展，雙方為此還研擬今後拓殖方案及處置原則。這些意想不到的結果，不禁讓我們想起 1837 年美國有類似的殖民經驗，民主黨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767-1845）因為推動「印第安人撤離政策」（The Indian Removal Act），同樣引發各方諸多反彈。[149]

失去土地的土龍山農民，除了犧牲個人權益外，還成為殖民與反殖民者的宣傳利器。強徵土地之舉造成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筆下形容的「羊吃人」那樣，[150]迫使許多民

147 論者指稱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活動經驗，或許有助於體察日本擴張滿洲的模式。Erik Esselstrom, *Crossing Empire's Edge: Foreign Ministry Police and Japanese Expansionism in Nor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 153.

148 以殖民臺灣為例，如 1915 年噍吧哖事件曾對地方社會結構與經濟體系造成衝擊。相關研究可參考 Paul Katz,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149 包括許多歷史學家在內，都對安德魯·傑克遜的行政措施進行猛烈攻擊。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His Indian Wa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pp. 226-253; Francis Paul Prucha, "Andrew Jackson's Indian Policy: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 no. 3 (December 1969, Bloomington), pp. 527-539; Alfred A. Cave, "Abuse of Power: Andrew Jackson and The 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 *The Historian* 65, no. 6 (Winter 2003, Abingdon), pp. 1330-1353.

150 1516 年，摩爾在《烏托邦》（*Utopia*）以英國「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為例，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眾流離失所，以致本來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地主富農」謝文東，決定鋌而走險，抵抗殖民政權的無理要求。結果謝氏一躍為舉國皆知的英雄，又經媒體渲染，大受矚目，變成各方亟欲拉攏或操作的對象，並延續至戰後的政局。

這場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並不亞於殖民當局本身。土龍山事件儘管宛若「巨浪」般迅速沉沒深洋，然其餘波依舊盪漾。對各地不斷湧現的反叛力量，滿洲國改以縮小省界及虛化效能等改造行政組織辦法來肆應，故「北滿」三省之成立實與土龍山事件息息相關。此一分化行政權的舉措，嗣後還賡續進行，並未隨滿洲政權結束而劃下句點。[151]即連中共對東北最早施行的土地改革，也從事件中獲得若干靈感。[152]

綜括言之，一位從「抗日英雄」到歸順皇民的「綠林之王」，謝文東及其土龍山傳奇無疑令人深感其戲劇張力。然而，當後人思考這件突發事件時，往往只戴上民族大義、國家利益等面具，反倒忽略歷史行動者面對選擇時的各項思考。倘使仔細觀察他們的舉動，便可發現：地方基層民眾有時為求自我生存及爭取權益，做出不同的決議與行動，卻可

斥責這帶給底層民眾一場災難，是所謂「羊吃人」的現象。Charles E. Orser Jr., *A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6), p. 155. 圈地運動係發生於 12-19 世紀的英國，由於受到工業革命與農業機械化影響，大量勞動人口或農奴被釋放出來，導致地主與貴族開始圈占「公有地」，並作為牧場養殖羊隻。此舉影響到農民生計，導致他們群起反對，結果愈演愈烈，引發四處暴動。後來這場經濟革命與社會問題更擴展至歐洲大陸。相關討論極多，可見 W. A. Armstrong,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in England and Wales, 1750-1914,"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29, no. 2 (1981, London), pp. 71-82.

151 譬如後來成為戰後中國省區規劃之基礎。中央設計局東北調查委員會編，《偽滿現狀》（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45 油印本），頁 5；張婷，〈民國時期東北九省劃分之分析〉，《社會科學輯刊》2003 年第 6 期（瀋陽），頁 184-187。

152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rold M. Tanner, "Guerrilla, Mobile, and Base Warfare in Communis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Manchuria, 1945-1947,"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 no. 4 (October 2003, Lexington), pp. 1181-1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不經意地掀起一陣波浪，甚至牽動歷史的長河。事件本身猶如「創意元素」（creative element），不再僅為客觀之作用，而是由不同勢力、不同條件所添加構成的產物。或許以此看待遙遠偏鄉的土龍山，吾人將有更清楚的認識。

*本文為 2018 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非正式帝國的地方基礎：滿洲國大同學院之活動及其變遷」（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1-016-MY2）之研究成果。初稿承蒙黃自進、鍾淑敏等教授在學術會議上指正，復經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惟文責仍應由筆者自負。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黃方碩　陳冠輔　廖芷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抗日消息・謝文東圍攻依蘭縣・擊斃偽軍四十名及日籍教官西山〉,《東北通訊》第 2 卷第 13 期,1934 年 8 月,北平,頁 3-4。
〈抗日消息・謝文東實力雄厚・日陸軍海空軍聯合進攻〉,《東北通訊》第 2 卷第 10 期,1934 年 6 月,北平,頁 4-5。
〈東北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戰時農村宣傳資料》第 1 輯,1938 年 7 月,漢口,頁 9-10。
〈東北消息・東北義軍近況〉,《外交週報》第 2 卷第 1 期,1934 年 7 月,北平,頁 11。
〈精神講話資料・東北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溆浦教育》第 1 卷第 26-27 期,1938 年 7 月,溆浦,頁 21-23。
《大公報》。天津、上海、重慶、桂林等: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大同報》。新京。
《天聲報》。北京。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
《立報》。上海。
《東北日報》。瀋陽。
《前進報》。瀋陽。
《泰東日報》。大連。
《盛京時報》。奉天。
《滿洲國政府公報》。新京。
《戲曲新報》。北京。
《大阪每日新聞》。大阪。
《因伯時報》。鳥取縣米子市。
《報知新聞》。大阪。引自「神戶大学新聞記事」滿州(2-205)。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
中央設計局東北調查委員會編,《偽滿現狀》。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45 油印本。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東北「大討伐」》。北京:中華書局,1991。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 46、52 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
丹 楓,〈依蘭風光〉,《新滿洲》第 2 卷第 9 號,1940 年 9 月,長春,頁 189-190。
王侶芝,〈謝文東抗日討共始末記〉,《蘇州郵刊》第 2 卷第 5-6 期,1947 年 12 月,蘇州,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頁 61-62。
田伯烈，〈「滿洲國」視察記〉，《獨立評論》第 121 號，1933 年 10 月，北平，頁 8-13。
宇　飛，〈土龍山〉，收入光明半月刊社編，《東北作家近作集》，頁 21-45。上海：生活書店，1936。
冷鐵錚，〈日本對東北的武裝移民和中國人民的反移民鬥爭〉，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8 冊，頁 207-212。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李文襄，〈暴日在東北施行殖民地土地政策的反應——東北抗日的武裝農民領袖謝文東的故事〉，《東北論壇》創刊號，1939 年 1 月，重慶，頁 18-20。
李延祿，〈東北抗日義勇軍最近活動狀況〉，《大聲》第 11 號，1937 年 4 月，上海，頁 7。
李延祿口述，駱賓基整理，《過去的年代——關於東北抗聯四軍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
依蘭縣志辦公室編，《依蘭縣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
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季　青，《於無聲處聽驚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東北人物大辭典編委會編，《東北人物大辭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
金仲華，〈七年來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收入國新社編，《淪陷七週年的東北》，頁 70-88。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據 1938 年上海書店出版影印。
哈爾濱清理水災善後委員會編，《壬申哈爾濱水災紀實》。哈爾濱：哈爾濱特別市公署，1934。
姚組訓監修，李翰昌協修，毛祝民總纂，《磐石縣鄉土志》。出版地不詳：磐石縣公署總務科，1937 鉛印本。
柳成棟整理，《依蘭舊志五種》。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
郝益之，〈我對謝文東的耳聞與眼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千秋功罪——佳木斯文史資料》第 10 輯，頁 260-268。佳木斯：編者印行，1989。
馬彥文，〈土龍山農民起義打死日寇飯塚少將〉，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37-40。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1。
高丕琨，《偽滿人物：偽總理大臣秘書官的回憶》。長春：長春史志編輯部，1988。
國，〈戰鬥中的東北抗日聯軍〉，收入松五等著，夏行編，《東北抗日聯軍游擊實錄》，頁 70-72。漢口：上海雜誌公司，1937。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編，《滿洲建國五年小史》。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7。
賀晉年，《深山剿匪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賀慶積，〈槍斃謝文東——三五九旅北滿剿匪紀聞〉，《黨史縱橫》1997 年第 2 期，瀋陽，頁 3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炎培，〈東井墾地概況〉，《教育與職業》第 9 期，1918 年 10 月，昆明，頁 1-8。
黃炎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
黑龍江省樺南縣志辦公室編，《樺南縣志》。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
楊　松著，劉晶芳編，《楊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劉白羽，〈敬話東北英雄——為第十四個「九一八」而寫〉，《新文化半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46 年 9 月 25 日，上海，頁 21-25。
遼寧省檔案館編，《滿鐵密檔：滿鐵與移民》第 1 分卷第 6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瞿明宙，〈日本移民急進中的東北農民問題〉，《東方雜誌》第 32 卷第 19 號，1935 年 10 月 1 日，上海，頁 61-71。
雞西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雞西市志》下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譚蔭縛，〈搜山—活捉匪首謝文東記—〉，收入中共佳木斯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合江剿匪》，頁 107-111。佳木斯：佳木斯人民政府鉛印室，1988。
嚴紹璗，《日本的中國學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伍海德（H. G. W. Woodhead）著，張珂等譯，張文琳等校對，《我在中國的記者生涯：1902-1933》。北京：線裝書局，2013。
〈三江省第一次縣長會議に於ける日本農業移民招致問題〉，《東洋》，第 38 卷第 10 號，1935 年 10 月，東京，頁 129-131。
〈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狀況〉，《外事警察報》第 177 號，1937 年 4 月，東京，頁 126-128。
〈満州国協和会中央事務局次長山口重次関東軍司令部参謀長宛（康徳元年六月八日）〉，收入国立国会図書館専門資料部編，《斎藤実関係文書目録》。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1995。
「土地買収と土龍山事件との関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1002972600、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9-4-3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満洲開拓民ニ関スル根本方策ニ関スル件ヲ定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2030129100、公文類聚・第六十三編・昭和十四年・第六十一巻・外事三・国際三・通商・移民・雑載（国立公文書館）。
人事興信所編，《第十四版　人事興信録》。東京：編者印行，1943。
大原信一，〈ある満州体験〉，《同志社外国文学研究》第 33-34 號，1982 年 9 月，京都，頁 19-34。
小山一郎，《滿洲國及北支の金鑛及砂金》。東京：科學主義工業社，1938。
小原瓢介，《飄々乎》。長野：長谷川書店，1985。
山下武男，〈謝文東が歸順するまで〉，《協和：滿鐵社員會機關誌》第 241 號，1939 年 5 月，大連，頁 22-25。
山川隣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電報通信社，1944。
中西利八編纂，《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村孝二郎，〈依蘭事変余聞〉，收入満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満洲開拓史》，頁 120-122。東京：全国拓友協議会，1980。
內尾直昌編，《康德元年版　滿洲國名士錄》。東京：人事興信所，1934。
引田哲一郎，〈朗らかな武裝移民地・最近の永豊鎮・湖南營便り〉，《東洋》第 38 卷第 10 號，1935 年 10 月，東京，頁 38-40。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新訂　政治家人名事典　明治～昭和》。東京：編者印行，2003。
木下通敏，《満洲に於ける農業経営の実際と移民問題》。東京：斯文書院，1934。
水島芳静，《日本移民の新天地躍進三江省：佳木斯市》。東京：東亜出版社，1938。
水野福德、石川伝三、井上実，〈土龍山事件と密山工作〉，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滿洲：國つくり產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150-151。
片倉衷，《戰陣隨錄》。東京：经济往來社，1972。
加藤聖文編，《海外引揚関係史料集成（国外篇）》。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
古海忠之，《忘れ得ぬ滿洲国》。東京：经济往來社，1978。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
民政部編，《第一回全國縣參事官會議議事錄》。新京：編者印行，1934。
田浦雅德、古川隆久、武部健一編，《武部六蔵日記》。東京：芙蓉書房，1999。
白鳥省吾，《詩と隨筆の旅：滿支戰線》。東京：地平社，1943。
石川進，〈滿蒙——滿洲國關稅改正・農地商租と所謂土龍山事件・三鐵道新設〉，《東洋》第 38 卷第 1 號，1935 年 1 月，東京，頁 136-138。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4 號，1935 年 4 月 15 日，大連，頁 1-52。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二）〉，《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 15 日，大連，頁 37-70。
石井俊之，〈吉林省內三姓、勃利地方經濟事情（三）〉，《滿鐵調查月報》第 15 卷第 6 號，1935 年 6 月 15 日，大連，頁 65-108。
石井俊之，《私の回顧錄》。金沢市：橋本確文堂，1983。
石原文雄，《東宮大佐と加藤完治》。東京：潮文閣，1944。
石原貞一，〈傷痕の県政〉，收入社団法人国際善隣協会編，《満洲建国の夢と現実》，頁 191-198。
安藤彦太郎，〈「九・一八」前後〉，《アジア経済旬報》第 874 號，1972 年 9 月，東京，頁 8-10。
寺尾正一，〈谷次亨氏の運命〉，收入文藝春秋編，《されど、わが「滿洲」》，頁 94-96。東京：株式会社文藝春秋，1984。
竹中憲一編，《人名事典「滿州」に渡った一万人》。東京：皓星社，2012。
谷次亨，〈開拓民と原住民〉，《東亞聯盟》第 2 卷第 2 號，1940 年 2 月，北京，頁 264-2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谷次亨，〈お互ひ謙虚にそして眞剣に〉，《開拓協和》創刊號，1940 年 10 月，新京，頁 9-13。
谷次亨，〈日本「開拓團」和移民的實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8 冊，頁 197-206。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宗光彦，〈千振街の匪襲と中村氏の思い出〉，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満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614-615。
東亞勸業株式會社編，《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拾年史》。大連：編者印行，1933。
松田俊彦，〈大陸回顧〉，收入滿洲国大同学院第二期生大陸回想録編集委員会編，《大陸回想録》，頁 57-72。東京：編者印行，1977。
歧部與平，〈收買開拓用地〉，收入島田三郎等著，公文逸編，《我們在滿洲做了什麼——侵華日本戰犯懺悔錄》，頁 70-71。北京：群眾出版社，2016。
社団法人国際善隣協会編，《満洲建国の夢と現実》。東京：国際善隣協会，1975。
金丸精哉，〈滿洲採金餘譚〉，《滿蒙》第 15 年第 2 號，1934 年 2 月，東京，頁 117-133。
島之夫，《滿洲國視察記》。東京：博多成象堂，1940。
秦賢助，《東宮鉄男：満洲移民の父》。東京：時代社，1941。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創立七十周年記念　物語大同学院—民族協和の夢にかけた男たち—》。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2002。
森山誠之，〈忘れ得ぬ協力者たち〉，收入社団法人国際善隣協会編，《満洲建国の夢と現実》，頁 176-183。
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満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東京：農林出版株式会社，1965。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0-1971。
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会編，《滿洲開拓史》。東京：全国拓友協議会，1980。
筒井五郎，《鉄道自警村—私說・滿州移民史—》。東京：日本図書刊行会，1997。
新沼勝三郎，〈更生した綠林の王者・謝文東〉，《雄弁》第 30 卷第 7 號，1939 年 7 月，東京，頁 178-183。
滝本實春，〈土龍山事件〉，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満洲：國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頁 147-150。
滝本實春，《遠い跫音》。高知市：リーブル出版，2003。
滿洲國治安部著，吉林省公安廳公安史研究室、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編譯，《滿洲國警察史》。長春：編者印行，1990。
滿洲國軍政部軍事調查部編，《滿洲共產匪の研究》。新京：編者印行，1937。
滿洲國通信社編，《滿洲國現勢》。新京：滿洲弘報協會，1937。
滿蒙資料協會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東京：編者印行，1940。
横川次郎著，陸汝富譯，《我走過的崎嶇小路——横川次郎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1。
澤地久枝，《もうひとつの満洲》。東京：文藝春秋，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藤川宥二，《実録・満洲国県参事官—大アジア主義実践の使徒—》。大阪府堺市：大湊書房，1981。

關東軍特務部，〈滿洲農業移民根本方策（案）〉，收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濟調查會編，《滿洲農業移民方策——滿洲拓植株式會社設立方策》，頁 8-18。新京：南滿洲鐵道經濟調查會，1936。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perley, H. J. “Japan in Manchukuo.” *Foreign Affairs* 12, no. 2 (January 1934, New York), pp. 304-305.

二、近人研究

王元周，〈日本在中國東北移民的農業經營（1905-1945）〉，《抗日戰爭研究》1999 年第 4 期，北京，頁 75-89。

王躍斌，〈擊斃飯塚大佐〉，《歲月》2012 年第 12 期，邯鄲，頁 24-27。

衣保中、馬偉，〈日本「東亞勸業會社」對中國東北土地資源的掠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7 卷第 5 期，2017 年 9 月，長春，頁 83-91。

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林志宏，〈兩個祖國的邊緣人：「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與性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4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45。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頁 643-683。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

俞慈韵，〈研究日本侵華、解剖殖民地需要大著——《偽滿洲國史》編後〉，收入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頁 661-670。大連：大連出版社，1990。

張　婷，〈民國時期東北九省劃分之分析〉，《社會科學輯刊》2003 年第 6 期，瀋陽，頁 184-187。

張素玢，〈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2 期，2009 年 3 月，臺北，頁 33-7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傅林祥、鄭寶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解學詩，〈偽滿洲國的政權體制和基層社會組織〉，收入楊天石、庄建平編，《戰時中國各地區》，頁 1-2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蔡少卿主編，《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Kazuo Yamaguchi 著，杜素豪、黃俊龍譯，董旭英校閱，《事件史分析》。臺北縣：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1998。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劉北成譯，《論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林英夫，《帝国日本と総力戦体制：戦前・戦後の連続とアジア》。東京：有志舎，2004。
小林英夫，《満鉄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2006。
小都晶子，〈日本人移民政策と「満州国」政府の制度的対応—拓政司、開拓総局の設置を中心に—〉，《アジア経済》第 47 巻第 4 号，2006 年 4 月，東京，頁 2-20。
小都晶子，《「満洲国」の日本人移民政策》。東京：汲古書院，2019。
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上）〉，《歴史評論》第 142 号，1962 年 6 月，東京，頁 46-64。
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中）〉，《歴史評論》第 143 号，1962 年 7 月，東京，頁 62-77。
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下の一）〉，《歴史評論》第 145 号，1962 年 9 月，東京，頁 66-73。
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下の二）〉，《歴史評論》第 146 号，1962 年 10 月，東京，頁 65-77。
田中武夫，《橘樸と佐藤大四郎：合作社事件・佐藤大四郎の生涯》。東京：龍溪書舍，1975。
安藤哲，〈日露戦後の満州移民村〉，《那須大学・宇都宮共和大学都市經済研究年報》第 5 巻，2005 年 10 月，那須塩原，頁 196-203。
江夏由樹，〈近代東北アジア地域の経済統合と日本の国策会社—東亜勧業株式会社の事例から—〉，《東北アジア研究》第 8 号，2004 年 3 月，仙台，頁 1-24。
岩崎富久男，〈中國東北における抗日救亡運動—東北抗日義勇軍の活動—〉，《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 46 巻，2000 年 3 月，東京，頁 41-64。
林志宏，〈冷戦体制下における大同学院同窓会——日本と台湾の場合〉，收入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頁 253-277。東京：東方書店，2020。
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編纂委員会編，《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松江市：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編纂委員会，1974。
孫繼英著，上條厚譯，〈土竜山農民の抗日蜂起〉，收入植民地文化学会編，《近代日本と「満州国」》，頁 243-248。東京：不二出版，2014。
桑島節郎，《満州武装移民》。東京：教育社，1979。
高橋泰隆，〈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満州」農業移民〉，《土地制度史学》第 18 巻第 3 號，1976 年 4 月，東京，頁 47-67。
高橋泰隆，《昭和戦前期の農村と満洲移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淺田喬二，《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來社，1973。
劉含発，〈満洲移民の入植による現地中国農民の強制移住〉，《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第 21 巻，2001 年 8 月，新潟，頁 361-378。
Armstrong, W. A.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in England and Wales, 1750-1914.”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29, no. 2 (1981, London), pp. 7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arton, Gregory A.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Rise of One World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Cave, Alfred A. "Abuse of Power: Andrew Jackson and The 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 *The Historian* 65, no. 6 (Winter 2003, Abingdon), pp. 1330-1353.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ogan, Anthony.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PhD diss.,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1991.

Esselstrom, Erik. *Crossing Empire's Edge: Foreign Ministry Police and Japanese Expansionism in Nor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Katz, Paul.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Lee, Chong-Sik.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Orser Jr., Charles E. *A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6.

Osterhammel, Jürgen.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Edited by Wolfgange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rucha, Francis Paul. "Andrew Jackson's Indian Policy: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 no. 3 (December 1969, Bloomington), pp. 527-539.

Remini, Robert V. *Andrew Jackson and His Indian Wa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Tanner, Harold M. "Guerrilla, Mobile, and Base Warfare in Communis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Manchuria, 1945-1947."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 no. 4 (Oct. 2003, Lexington), pp. 1177-1222.

Wright, Tim. "Legitimacy and Disaster: Responses to the 1932 Floods in North Manchuria." *Modern China* 43, no. 2 (March 2017, Beverly Hills). pp. 186-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9 (Jun. 2022), pp. 1-53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206_(69).0001

The Legend of Tulongshan: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mmigration in Manchukuo and its Narration

Lin, Chih-hung*

Abstract

The "Tulongshan Incident" broke out in Yilan (依蘭) county on March 10, 1934. Driven by local discontent with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land expropriations and confiscation of weapons, Bahuli village chief Xie Wendong (謝文東) organized the "People's National Salvation Army" to resist. This armed uprising during the Manchukuo period (1932-1945) lasted for several months and ha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Not merely a "popular uprising," the Incident reveale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Manchukuo authorities over the principles of colonial rule, and also foreshadowed the later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olitics of northeastern China.

This essay clarifies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how the Incident unfolded and its significance. First, immigration became subject to challenge by the colonists themselves. Setbacks experienced by the Kwantung Army caused Japanese in Manchukuo to question colonial policy, with the most notable instance being the resignation of seven Japanese county councilors to publicly oppose what they viewed as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ethnic harmony." Second, voices of opposition and discontent within Manchukuo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vernment "Colonization Section" in April 1935 to jointly participate in colonial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28 Academia Rd, Sec. 2, Nankang, Taipei 115201, Taiwan
E-mail: mrc@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ctivities with Japan. Subsequently, Manchukuo authorities sought to actively coordinate with Japan and formulated the "Basic Out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kuo" in Tokyo. Third, what was 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launched by local farmers opened up a field of ideological contestation.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United Front," the CCP absorbed Xie Wendong's forces,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while the Manchukuo state adopted bandit suppression/anti-Communism as a political objective, which Xie Wendong also promot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fter his surrender. Finally,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Tulongshan Incident was recounted overseas, and what this legend reveals.

Keywords: Tulongshan Incident, Manchukuo, Japanese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Xie Wend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